



钉碗担/李三汉作

钉碗又称补碗、锅碗。补碗师傅先将破碗用细胶泥粘拼完整,再用金钢钻在碎片上对应钻眼,然后用铜钉铆进去加固。

#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WENSHIZILIAO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方方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徐明庭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鹏 甘琼 龙桃仙 朱向梅  
刘重武 李修文 杨华 杨守权  
邹仕芳 汪利珍 张霞 陈光  
姚四平 殷小琴 韩继红 曾艳红  
窦梅 潘红莲

主编：殷小琴

副主编：周敏

责任编辑：张川蕾

编辑：华蕾 夏雪辉

封面设计：夏金钟

## 历史回眸

### 4 新中国空军开通“世界屋脊”上的航线

/叶介甫

## 往事漫忆

### 10 葛洲坝工程的移民动迁和安置/黄永贵

### 16 忆李尔重同志/莫元钦

### 21 当年我“跑”新闻/李乔

### 25 抗战中的牛堤口中心税卡

/李志华(口述) 陈世高(整理)

## 史海钩沉

### 28 陈友谅墓修缮史小考/甘超逊

# 目 录 | MULU

2017年第5期(总第295期)

## 再回首

34 你我的往事(十三)/方 方(主编)

## 汉口徽商

40 黄心鑫与汉口/刘富道

## 礼乐稽古

48 杯酒释礼(上)/杨 华

## 都市史话

57 鄂中渔鼓/李笙清

## 文苑艺林

62 雅舍清风笔墨情

——“顾蓓、王心耀教授中国画小品展”简述  
/李瑞洪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政协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20日

定 价:6.00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82220667 82220695

(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zsl@163.com

◇叶介甫

## 新中国空军开通“世界屋脊”上的航线

### (一)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交通困难,同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不方便,各方面的发展受到了限制。1955年12月,党中央为了帮助藏族人民建设新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决定开辟北京—拉萨航空线,并指示空军在总参谋部的直接领导和兰州军区、西藏军区的协同下组织实施,完成任务。

1956年3月,空军把向高原进军的重要任务交给了航空兵某团。任务主要是三项:一是空中试航,打开北京—拉萨的空中航道;二是找出一条适合当时运输机飞行性能的航线,为运输进藏物资和部队开辟通路;三是在4月22日飞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会场上空撒传单、低空

示意,以鼓舞民心,同时肩负为在高原修建机场、建立导航台等设施选点的任务。

空军首长在向航空兵某团交代任务时,把这次开辟航线的任务比作“空中尖兵”,并告诉大家,赴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非常关怀通航工程,行前嘱咐过空军:“大会结束,我要乘飞机回来!”听首长的传达,当时作为一团之长的姚长川心情很激动,为自己的部队能承担这样的重任自豪,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巨峰林立,气候恶劣,地图不准,导航设备缺乏,过去曾被视为“空中禁区”。今天,他们则要闯过“禁区”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航线来,面临的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飞机的航程问题。开辟航线的飞机是活塞式杜—4飞机,它的飞行高度

是3000米,再往上飞越高越费油,而在高原飞行多在7000米以上,飞机的续航时间在有利飞行高度上减少了三分之一,这能否满足从驻地武功机场往返拉萨的需要(一般多在10小时以上)?从飞机说明书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其二是缺乏地理资料和可靠的航图,增加了航行的困难,特别是还要为运输机选择航线,这就要求不仅本身要飞准,还需要负责校正地图,准确测量地标位置和主要山峰高度,找出一条运输机能穿越的通道,工作就更难了。其三是天气恶劣多变,难以掌握,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和飞行安全。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机组发动群众,想方设法,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飞机加装了副油箱,重新计算了航程和飞行重心,并多次进行了试飞检验,广泛搜集和综合分析研究了各种地图资料。针对高原天气午后转坏的特点,采取夜间起飞,午前返航

的措施,预想了可能遇到的复杂困难情况及处置方法等等,使飞行建立在尽量可靠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参加开辟航线任务的广大地面工作人员进行了更紧张、更艰苦的工作。他们克服了空气稀薄、人体不适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越过瘴气弥漫、严寒封锁的巴颜喀拉山,冒险将载重汽车从已开始融解的冰上开过通天河,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设立了导航点、气象台,工程兵和民工日以继夜地赶修机场,为试航飞行提供了有力的地面保障,极大地鼓舞了机组人员完成任务的信心。

## (二)

3月19日,当关中平原还是夜幕笼罩,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试飞机组从武功某机场起飞,开始了第一次试航飞行。姚长川

驾驶着满载油量重达60吨的杜—4飞机,沿着航线艰难地爬升,向西前进。

经过1个多小时的夜间航行,飞机在晨光映照下进入了青藏高原上空。俯瞰大地,只见莽莽雪原起伏不断,弯弯曲曲的河流错综交叉。机上的同



1956年,飞行员驾驶飞机探索适宜航路

志对照地图找地标，然而不是地标搬了“家”，就是河流改了道，图上没有标注的湖泊、山峰接二连三地出现，总之，同手中这份民国十八年(1929年)版的航图很少对上号。领航员们不断地观察、测量和计算，利用仪器和山川、湖泊等自然标志反复检查飞机航迹，校正地图的准确性。

根据飞行时间，按第一领航员栾一男的综合计算，该到了飞向拉萨的第一个重要地标——黄河沿了，可却见不到它的踪迹。这个关键的位置不确定，以后的航行也就无所依据。大家利用天文仪器校对了飞机的航向，检查了测得的高空风资料，自信航迹是正确的，并根据地势判断黄河沿在飞机的右前方。于是，姚长川操纵飞机右转弯进行搜索，机上几双眼睛紧紧地盯住地面，盘旋复盘旋，搜索又搜索，雪光刺得眼睛发痛，气流颠得恶心难受，但这丝毫也转移不了大家的视线。骤然，前舱领航员芦予从座位上立了起来，指着前方高兴地说：“看见了！”姚长川向前望去，只见碧玉般的鄂陵湖静静地卧在地面，光泽平坦的青藏公路绕过湖岸伸向远方，路旁有几间土色的矮房，旁边摆着一个红色的“T”字，它就是大家所要找的黄河沿。经过计算核对，与地图上标记的位置相差竟达68公里。接着，大家越过险峻的巴颜喀拉山，进入玉树地区，勘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和运输机即将使用的准确位置和净空情况。

更艰巨的航程开始了。刚过玉树不久，插入云天、逶迤千里的唐古拉山迎面扑来。那巍然起伏的群峰，裹着朵朵白云，犹如咆哮的大海在翻腾，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闪着耀眼的银光。高原山区特有的强烈激荡气流，似连天波涌，袭向飞机，把飞机颠上抛下，左摧右拽，骤然升降几百米。按照

通常情况，碰上这样恶劣的气流，应当改变高度，或者返航。像这样的天气，只要再爬升两三千米，肯定会平稳得多，但那样会影响测量山峰标高的准确度，而且增大了油料消耗量，返航又将推迟通航时间。他们决心坚持原计划飞行。姚长川立即关闭了自动驾驶仪，同右座飞行员韩永峰一起紧紧地把握住驾驶盘，拼尽全力稳住飞机。仅仅几分钟，两人就累得满身是汗，机组的其他成员被颠得头晕目眩，一个个都呕吐起来，领航员芦予的头撞在座舱盖上碰了个包。但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人人沉着镇定，更加精细审慎地进行各自的工作。他们飞向一座座陡峭的山峰，测量它们的高度；越过一个个峡谷，寻找适合运输机穿越山岭的通道。高度表指示的高度虽然是7000多米，但实际距离却靠近了山顶；有时感到飞机似乎要撞山了，有时飞临峡谷上空又好像机翼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经过近1小时扣人心弦的航行，他们校正了一些重要地标，勘明了唐古拉山东部的地形情况，发现这部分山区山势险峻，山高多在6000~6750米，不适合运输机飞行，于是放弃了从这里越过，飞向拉萨的打算。

相隔几天，他们又前后几次经过玉树从中部和西部飞越了唐古拉山。这几次飞行，正赶上西伯利亚寒流袭向青藏高原，天气突然恶化，他们经常要顶着每小时200多公里的强劲空中风，迎着汹涌的气流，在厚达几千米延绵上千公里的云中飞行。地面上除了那些冒出云海的兀峰以外，常常是什么也看不见，仅有的两个导航台因为在山沟里，距离太近也无法利用，只能靠推测和机上雷达进行航行，还要时刻提防危险天气的威胁。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领航员们经常是盯着光亮耀眼的雷达荧光屏，从那杂乱的

影像中搜索、识别需要的地标，寻找通往拉萨的航路；通信员在强烈的天电干扰下不间断地与地面保持联络；空中机务人员密切注视着发动机和各部的工作情况，不断地检查油料消耗量，及时



1956年5月26日，试航飞机在拉萨当雄机场着陆后，藏族人民欢呼起舞，参观从天而降的“神鹰”

调整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全机组就像一部机器在准确、协调地运转。

就这样，他们从中、南、北3路4次试航，越过云海雾障、险山峻岭，每次连续飞行十一二个小时，航迹几乎遍及了青藏高原，终于在从没有飞机到过的冰峰雪岭之中找到一条飞往拉萨的航线，并准确量出航线上各点位置和山峰高度，校正了地图，为以后的飞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 (三)

4月3日，打开“世界屋脊”上空航道的日子到来了。

这一天，当拉萨还被晨雾笼罩的时候，机组驾驶的杜—4飞机已经连续进行了几小时的夜间飞行，飞过岷山，越过巴颜喀拉山，出现在唐古拉山上空了。沿途，他们对航线两侧的山高和地标再一次做了测量、校正，力求使之更准确一些。那天高原天气格外晴朗，刚过唐古拉山不久，在150公里以外，就看到念青唐古拉山7300米的主

峰，如一座庄严的古城堡，昂首屹立在群山之中，成了他们的天然导航点。

随着飞机的迅速前进，一排排的山峰在他们的机翼下消失，视野豁然开朗，前面再不是高山峻岭，而是辽阔丰饶的藏北草原了。地面上排列着牧民们雪白的帐篷，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牛羊，蓝色绸缎般的腾格里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像千百万大军镇守在国境线上。拉萨快到啦！激动和喜悦，振奋着机上每一个人，驱走了长时间高空飞行的疲劳。飞机顺利地通过了念青唐古拉山山口，向右转弯寻找目标——拉萨附近正在修建的当雄机场。

10时39分，飞机准确到达目的地。拉萨上空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了飞机发动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它像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向全世界宣告：横贯“世界屋脊”的航道终于被年轻的人民空军打通了。大家抑制住心头的激情，姚长川一面命令通信员张克力立即给部队发报“到达拉萨”，好让党中央放心，一面降低高度盘旋，向拉萨

人民摇摆机翼致意。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这一天拉萨市万人空巷,人们像潮水般地涌上街头,爬上屋顶,登上山坡,翘首欢迎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天菩萨——毛主席派来的飞机,许多人激动地流下喜悦的泪花。

随着通航的日期越来越近,各项准备工作加速进行,当雄机场日夜不停地施工,准备保障试航运输机的起降飞行。

该机场标高 4224 米,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北面紧挨着险峻高大的念青唐古拉山,净空条件很差。将来运输机能不能在这里安全起降,因为缺乏准确的资料,一时还难以回答。空军首长命令部队在试航成功以后,尽快地对当雄机场及其净空地带进行航测,查明它的净空情况和有关资料,以便送呈中央首长审阅,最后定下通航决心。

从武功到当雄往返需 9 个多小时,加上 1 个多小时的空中连续照相,预计油量已较紧张。而当时又正值暖锋过境,航线天气恶化,油量就显得更加紧张,沿途又没有任何供备降的机场。团党委决定把任务交给已有几次高原飞行经验的一大队大队长梁平机组去执行,姚长川亲自担任当日的飞行指挥员。

4 月 18 日凌晨 4 点多钟,梁平机组冒着霏霏细雨又一次起飞。飞机刚过岷山,天还未亮,突然被浓云紧紧裹住,速度猛然下降伴有中度颠簸,加大油门才能勉强维持住速度,但高度上不去。向外观察,除了翼尖灯的光什么也看不见,梁平凭自己丰富的经验,判断是天气预报失误,飞机进入了暖锋后,出现了结冰,除冰设备全打开仍不见效。这时飞行高度才 4500 米,而前面又是一座座 6000 多米高的山峰。若改变航线,在这黑茫茫的夜空中,难保不再陷入更恶劣的天气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梁平

果断地做出了在原地盘旋,慢慢争取高度的决定,以他精湛的技术操纵飞机非常缓慢地上升了 500 米。这时,机组有的同志建议返回机场,但梁平没有采纳,他严肃地说:“周总理在北京等着看照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在他坚毅勇敢精神的鼓舞下,全机组信心倍增,同恶劣的气象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空中的情况和机组的决心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机场塔台,人人都为这次任务的完成和机组的安全担心。姚长川心里明白,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指挥员越要沉着镇静,便命令机组及时报告飞行情况,同时找气象员研究分析天气变化趋势,要机务主任准确计算油量。40 分钟过去了,按报来的情况看,飞机还在原地盘旋,不禁有些着急,想命令机组返航,但又想到胆大心细、技术过硬的梁平曾多次在危险情况下正确处理、化险为夷,相信他这次一定会妥善处理,再说预报的天气在好转,油量也还够,于是电告机组:“掌握油量,相机行事,力争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艰难飞行,暖锋逐渐南移,天也亮了,飞机终于爬升至云上,积冰消融,一切又恢复正常状态。机上领航员徐静进行了精确计算,判定飞机已被强烈的空中风吹离航线 140 公里,偏在毛儿盖附近,并按推测位置修正了航向。几十分钟后,转弯点玉树附近的高峰不偏不倚地出现在飞机前方,证明了推测的位置相当准确。“到达玉树,一切正常”的电报传到了地面,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机组按预定任务执行,继续注意变化,控制好返航油量。

复杂多变的高原天气好像要专门考验梁平机组,当他们在当雄完成航测任务返



航时,地区性的雷雨又汹涌而起,从玉树到岷县的航线上,到处矗立着一个个参天宝塔似的云柱,电光劈空,此灭彼明,飞机如同临近了即将爆发的火山群。梁平迅速操纵飞机上升,再上升,一直上升到接近飞机升限高度 9000 多米,但雷暴云仍屹立在面前。梁平果断地采取了绕飞措施,像船舶避开暗礁一样,驾驶飞机在雷雨中曲折飞行,绕过一个个无法与之抗争的“敌人”。本来不多的油量现在显得更紧张了,中途也没有任何机场可备降。空中工程师不断地检查剩余油量,领航员随时掌握飞机位置、推算返回机场的航向。机上谁都清楚,除了冲出雷雨区,飞向本场,再没有别的出路。下午 4 点多钟,梁平机组终于突破雷雨包围回到了武功机场。飞机下滑着陆时,4 个油量警告灯全都在闪亮,预示着油量将尽。

正是这次长达 12 个多小时、历尽风险的飞行,换来了极为宝贵的当雄机场空中照相资料,为通航拉萨创造了有利条件,赢得了时间。

4 月 22 日到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如期召开,姚长川率领三大队长张国样机组,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空中使者,飞向拉萨,祝贺大会胜利召开。

经过多次试航,青藏高原对他们已不再神秘莫测了。他们沿着熟悉的航线,一面校正航线各点位置和山高,为以后运输机的飞行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一面反复校正到拉萨的预计时刻,做到准时到达。几个小时以后,拉萨接近了,壮丽的布达拉宫,黄顶的喇嘛庙,一个个尖尖的屋顶,展现在眼前。10 时整,当陈老总出现在筹委会大会主席台上时,飞机准时到达,会场上满眼飘扬的彩旗和欢乐的人群。为了使藏族同胞更清楚地看看自己的“天兵天将”,显示人民

空军的神威,姚长川指挥机组一再降低高度,在会场上空低飞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并投下五彩缤纷的庆贺传单。山城沸腾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跳跃,不断地挥动着彩旗,向空中致意,表达了百万藏胞对党的爱戴,对开辟拉萨航线将给西藏带来繁荣的喜悦心情。最后机组摆动机翼向大会告别,满载藏族同胞的情谊返回基地。

继这次飞行之后,英勇的空军航空兵某师运输机飞行员们以他们刚毅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战胜各种困难,多次飞到拉萨,并于 5 月 26 日第一次在当雄机场安全着陆。至此,北京—拉萨航空线胜利开辟成功了。

党和政府对于这次航线的开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亲手签署了嘉奖令,称赞年轻的人民空军“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1956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姚长川受邀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观礼。最使他难忘的是,当年空军第一次党代会期间,刘亚楼司令员还带他晋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听了刘司令员的汇报,频频点头连声说,好!好!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部队、对所有参加开辟航线工作的同志给予的最高奖赏。

◇黄永贵

## 葛洲坝工程的移民动迁和安置

葛洲坝工程复工以后，为充实移民工作班子，我有幸来到宜昌地区三三〇移民办公室工作。如今宏伟的葛洲坝工程早已全部竣工，电厂发出的强大电流正有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工程抬高的水位，使部分川江航道天堑变为通途，实令人雀跃。然而在感奋之余，不禁联想到当年为保证葛洲坝工程顺利进行而从事的库区移民工作的往事。

### 移民概说

自1970年12月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后，移民的动迁和安置工作便提到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按照工程设计要求，库区正常蓄水位为66米，水库面积79.32平方里，其淹没地区涉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宜昌、秭归、巴东三县，受淹

耕地达1.32万多亩，需要动迁人口为2.85万多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70%。淹没的主要范围在宜昌地区。

为适应工程施工需要，做好移民工作，1971年6月初，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便成立了地区移民办公室。是年8月又成立三三〇移民领导小组。次年2月改地区移民办公室为三三〇移民办公室。1975年初，葛洲坝主体工程复工，移民机构随之充实。到1977年5月，宜昌地区革委会重新调整了三三〇移民领导小组成员，确定移民办公室与地区民政局合署办公。之后又几经变迁，1984年4月宜昌地委和行署遵照《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批复》的精神，才又重新设置宜昌地区移民办公室，1992年改名为宜昌市移民局。

当时移民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按照葛洲坝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动员和组织

移民如期迁出施工区和水库区，并负责对移民的生产生活进行安置，帮助他们早日重建家园。在移民方式上，规划确定为两种：一是外迁枝江，这一工作于1973年至1974年进行了外迁试点，迁出一批秭归县的移民，就业门路以粮棉油生产为主；一是内安，即将宜昌县移民安置在本县的鸦鹊岭等地，就业门路主要是发展柑橘生产，辅之以加工、运输和二、三产业，这样便可将秭归、宜昌两县移民全部消化。之后，又改变了原规划，两县基本上采取了就地后靠的办法。到1980年底，淹没线以下的移民全部迁出了库区。1979年至1983年的5年间，宜昌地区二县迁出移民7387人，其中宜昌县4271人，秭归县3116人，从而保证了大江的按时截流。

按照移民补偿政策，以“人头”为依据，当时人均补偿标准为650元。这笔费用包括移民建房补助、搬迁运输、生产救济等项。其后水电部鉴于物价上涨的因素，将标准调整到1142.5元。1978年至1984年的7年间，资金投放总数为3746.32万元，其中宜昌县1611.45万元，秭归县2036.37万元。另外，还拨支枝江县云盘湖试点移民经费194.52万元，云盘湖围垦经费263万元，宜昌县石桥电动排灌站经费120万元，宜昌县小溪塔防护工程经费500万元。

十余年来，宜昌地区移民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为葛洲坝工程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 移民前奏

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酝酿有日，及至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四天之后即12

月30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风尘仆仆从武汉赶到宜昌，在葛洲坝坝址绵羊洞沙滩10万人大会上，宣布葛洲坝工程正式动工。随后他又专门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宜昌地区广大移民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支援葛洲坝工程，确保该工程在1973年截流发电。会议一结束，宜昌地、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和各级负责人便全力以赴，进行施工区的移民工作。他们分别召集干部和群众大会，反复宣传兴建葛洲坝工程的伟大意义，学习毛主席关于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批示，教育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广大移民表示服从大局，到安置区去艰苦创业，重建家园。

就在大会前的两个月即1970年10月，工程施工队伍就已进场。施工区周围的移民首当其冲。宜昌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及县直属机关，他们不讲条件，不讲价钱，率先搬迁，仅用46天的时间，由城区迁出，至小溪塔镇重建新县城。市郊西坝的32户社员、160余人于一周内也全部迁出。这首批移民分别被安置在伍家和窑湾公社以及江南的十里红。接着1971年元月，位于东湖公社的中共宜昌地委党校、湖北宜昌二中、宜昌县高中、医院等单位也争先恐后，夜以继日，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迁出了施工区。同月，西坝公社（葛洲坝、西坝）的建设，幸福、和平大队和红光豆芽队、农科所等也从施工区迁出。当时施工区的干部群众犹如战争年代支前那样，支援工程建设的情景实在感人。截至同年3月，西坝、东湖两公社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共给葛洲坝工程局让出土地1440亩，从而保证了大围堰和开挖工程的用地。到1979年，葛洲坝第一期工程施工在宜昌市郊区共占用土地5300余亩，搬迁社员990余户、4000余人。

## 外迁枝江

为做好水库区的移民工作,1971年3月,宜昌地区和宜昌市、宜昌、秭归两县的民政部门会同三三〇工程指挥部勘测设计团,对葛洲坝枢纽水库淹没情况进行了测量调查。调查结果:宜昌市和宜昌、秭归两县有12个区、36个公社、109个大队、329个生产队、9个集镇的全部或局部位于淹没线以下,需要搬迁2250户、2.2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1.4万多人,城镇人口8000多人,淹没耕地1.3万多亩,林木21万多株。鉴于淹没范围多处处长江峡谷地区,土地条件较差,就地后靠人均难以达到一亩耕地等因素,并结合以后的三峡工程考虑,于是确定移民安置去向本着淹地还田的原则,除非农业人口就地后靠外,农村社员主要采取围垦和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办法。这些项目主要是:续建枝江县云盘湖围垦工程,可扩大垦荒面积2万亩,能接纳秭归县移民7500人;在宜昌县人少地多,但水源奇缺的石桥兴建电动排灌站,提高该地2万余亩耕地旱涝保收的能力,可安置宜昌县移民6000人。

1972年5月,枝江县云盘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和移民建房指挥部相继成立。同年10月,围垦指挥部从仙女、白洋、百里、新场四个区抽调民工9500人,移民建房指挥部从枝江和秭归两县抽调民工336人,汇聚云盘湖开始治湖、建房。第二年基本完成云盘湖围垦续建工程。1972年11月,宜昌县石桥电动排灌站也开始兴建,1975年3月竣工,修建库容42万立方米的水库一座,7850米长的引水渠3条,215米渡槽2座,宜昌至石桥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22公

里。这些工程的建成,为库区移民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3年7月,库区移民外迁试点工作开始,首批由秭归县茅坪区庙河乡迁入枝江县云盘湖围垦区的计58户、240人;第二年8月至9月,秭归县的立志、八斗、民意、泄滩等地移民又分四批陆续迁往云盘湖;移民试点的人数计190户、920人。

起初,这些秭归移民迁入枝江后,由原来在坡地上种玉米、柑橘转为在平原上种棉花,甚不适应。安置区政府对他们关怀备至,立即抽调一批思想、技术过硬的技术员,到各移民生产队进行具体的示范和指导,直到移民完全掌握全套技术为止。由于这些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比移出前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故迁入的1160人无一人返迁。

1979年2月,秭归县城关镇的望江、周坪公社庙垭大队又迁往枝江云盘湖的移民有303人。同年6月,动迁结束。至此,秭归县共外迁移民1463人。由于移入区政府的重视,加上当地土地条件较好以及移民自身的努力,这批外迁枝江围垦区集中安置的秭归移民生产发展甚快,人均纯收入达600多元。所有移民新建的住宅,不仅超过原房的质量标准,而且人均扩大建房面积20%以上。相当一批移民户购置了高档家用电器。约有30%的农户还翻盖了楼房,有25户买了汽车和拖拉机。回首当年从穷困山区走向富裕平原的秭归移民,这一举措是成功的。

## 就地后靠

1975年初,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三年后复工,并提出1980年底即进入大江

截流。这就是要求初期蓄水回水线(坝前63米)以下的移民务必在大江截流之前全部迁出。同时,水电部和湖北省革委会鉴于葛洲坝库区距1971年淹没调查已时隔7年,居民人数变化很大,于是于1977年5

月决定对淹没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宜昌地区移民办会同长办、三三〇工程局、省民政局参加了这次调查。同年10月调查结束。调查结果:水库淹没涉及宜昌市和宜昌、秭归两县的13个公社、13个集镇、329个生产队,社员、居民1.84万人;淹没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251个,房屋面积18.45万平方米;淹没耕地1.07万余亩;淹没公路(桥涵)27.7公里,铁路2公里,电讯线路130.4杆公里。

当时移民动迁和安置任务紧迫而繁重。然而,于1979年3月宜昌地区移民进入全面动迁之际,秭归县认为前段移民外迁工作量太大,且一部分移民不愿离开故土,同时移民外迁其生产安置经费随之带走,于本县不利,遂向宜昌行署写出报告,要求将移民就地安置,不再外迁。宜昌县闻讯后也写出报告,要求将移民由内安改为后靠。当时宜昌行署未考虑“往后靠”对后



上世纪70年代初,长江三三〇工程开工誓师大会

期的三峡工程有何影响,便同意全库区移民就地后靠。于是秭归、宜昌两县改弦易辙,从是年4月起集中力量抓后靠建房。他们实行统一规划,指标到队,标准到人,节约归己,超支不补,产权归己的原则,动迁和安置本县移民。至1983年,宜昌县先后安置移民共4217人,秭归县安置移民2813人。做到了移民如期迁出,从而保证了大江截流的顺利进行。

但是,移民规划的变动,却为后来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代价沉重。例如在场镇规划方面,秭归县香溪镇原规划其主要街道、单位均摆在八字门以北的公路两侧,以避免港口至八字门一带的滑坡体。该镇及至动迁时却在原地上移。葛洲坝蓄水后回水浸润滑体,使前缘河岸上软体化坍塌,从而引起上部滑体变活,造成地面挫裂,房屋拉裂。为此水电部曾安排200万元迁走了中小学、镇政府和113户居民。当前滑体上仍

有 1900 多人需要搬迁,国家还要再投资 700 多万元(包括建挡土墙)才能了结。又如在移民占有耕地方面,据调查,库区人均耕地(含柑橘园)0.5 亩以下的 20814 人,占库区总人数 58549 人的 35.5%;人均耕地 0.3 亩以下的有 11812 人,占 20%;无地农民 1036 人,占 1.8%,由于近 60%的农民耕地严重不足,国家每年要向安置区供应议转平口粮 250 余万公斤。仅此一项,每年增加地方财政负担 140 余万元(系 1988 年以前支出数)。

### 生产恢复

在完成葛洲坝第一期工程蓄水淹没线以下的移民动迁、建房之后,从 1981 年初起,宜昌地区移民工作的重心转入生产恢复。在 1981 年至 1984 年的四年间,全区用于发展生产的经费达 1032.2 万元,占同期投资总额 3746.32 万元的 28%。我们抓生产恢复的主要做法是:

一、以生产建设促进安置。除对外迁的移民,生产条件和住房解决于移民动迁之前外,移民由外迁改为后靠后,也注意在移民、建房的同时,由安置区组织改田造地和小型水利设施配套等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安置区的移民部门还专门聘请特产技术员帮助移民解决柑橘生产上的技术问题,从而为移民生产恢复创造条件。

二、依靠基层组织,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安置区各级组织对移民的生产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如宜昌县小溪塔镇渔业新村党支部在安置移民、开发生产门路方面,处处带领党员先行。他们在抓好种养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根据本村毗邻县城的有利地理位置,大

胆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兴办印刷、运输、建筑等骨干企业,并在库区率先普及了沼气。到 1988 年,全村年产值达 275 万元,是动迁前(1978 年)20 万元产值的 10 多倍。人均纯收入 820 元,比动迁前(1979 年)的 138 元增长近 6 倍。这个村正计划筹建退休基金,使移民老有所养。又如:宜昌县太平溪镇刘家河村在安置移民之初,党支部考虑到本村人多田少,移民中年老体弱、妇女多,就业困难和水土流失的实际情况,决定由村兴办柑橘场。他们动员全村劳力在库区沿岸开辟柑橘梯田 120 亩,栽培了柑橘 9000 余株,安置移民 25 人。办场初期经济效益较差,经过努力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1984 年以来,柑橘产量步步上升,1987 年在库区柑橘普遍减产的情况下,该场产量仍然达到 9 万多公斤,产值 7.5 万元,人均纯收入 1200 元。这个村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赞赏。

三、抓综合治理库区。经过水保部门的规划和库区各部门的配合,五年来,占库区总面积 59%的水土流失面积开始得到治理。25 度以上的坡地经过逐步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不断上升。过去那种“一个冬季坡改梯,一场大雨梯变坡”的状况得到了改变。这对于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的大农业生产、促进移民的安置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就整体而言,移民的生产恢复仍不尽如人意。移民安置的社员在淹没前人均有七分耕地,蓄水后一部分土地被淹,移民后靠建房又占用了一部分土地。这些年来,虽然在安置区发展了一大批柑橘园,因自然生长周期长,移民在近期不能受益,故不少生产队的社员收入水平比蓄水前大幅

度下降。据后来调查,老库区有移民任务的306个生产队中,超淹没前生产水平的有32个,仅占总数的10.46%;略低于淹没前生产水平的有165个,占53.92%;经过努力,在近期内仍难以恢复到淹没前生产水平的109个,占35.62%。如何尽快帮助移民把生产恢复发展到蓄水前的水平,特别是认真解决好109个困难队的生产生活问题,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 两岸受益

葛洲坝工程的兴建以及移民工作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库区两岸人民物质生活的改革。移民动迁以来,秭归、宜昌两县利用移民专项补偿经费架设了输电线路189.2杆公里。历史上从未通过电的宜昌县代石沟(新三斗坪镇所在地)和秭归县龙江区上孝两地,于1981年3月和9月,分别从江北架设高压过江电缆,使江南的217个生产队、5300户社员、26680人用上了电。黄牛岩顶、兵书宝剑峡旁的山巅,电视差转台相继建起。1984年仅这两地统计,社员新添置电视机560多台,电风扇420多台,收录机180多台。

解放前,西陵峡以滩多水急而闻名中外。著名的青滩、泄滩和号称“鬼门关”的崆岭都在宜昌地区境内。解放后航道虽几经整治,西陵峡区的交通状况仍然落后,沿江两岸陆上交通条件更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栈道,几乎成为峡谷区人民的唯一通道。葛洲坝第一期工程蓄水后,回水上溯巴东,水位提高了20余米,从此险滩夷为平湖,西陵峡航道得到根本改善。虽然回水亦使数以千计的沟沟汊汊由季节性淹没变为永久淹没,两岸的人行栈道也基本上没入水

中,但政府利用移民专项补偿费,从1981年11月起至1983年12月止,在库区两岸新修人行道路112公里,人行桥88座,新修公路24.8公里,改造公路11公里,设置渡船8只,新修港口9处,使库区人民和过往行人的交通得到恢复和改善。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其移民安置的成败关系重大。先走一步的葛洲坝工程移民动迁和安置的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了一面镜子。移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尊重科学,严格按经过论证的规划办事,这条经验是必须汲取的。

(闽江月整理)

◇莫元钦

## 忆李尔重同志

我一直在南方闲居,返回江城武汉,有位朋友告知,说李尔重同志逝世了,我顿感痛心,哀悼之情油然而生。

李尔重同志健在时,因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和他有过来往,得到他谆谆的教诲,那情景,就像影视画面浮现在眼前,至今记忆犹新。

### 唯有心灵最感君

建国之初,李尔重同志是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此后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尔重同志在汉期间,曾为武汉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和干部理论教育操过心、出过力、流过汗。而今尚健在的老同志和江城父老提到他,无不称赞他是一位好领导、好同志。

武汉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

子,工厂关门,商铺闭户,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百万市民嗷嗷待哺。在市委召开的扩大会上,市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果断地说:“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同时抓好干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我们要双管齐下。”接着吴德峰市长说:“双管齐下,重中之重是恢复生产,让大家有工做,有饭吃。抓紧干部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认识,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打好这两场硬仗。”

李尔重同志很清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他知道,刚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杀出来的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在战场上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转入城市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城后居功自傲,滋生享乐思想,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时有发生。因此,他觉得抓好干部理



论学习,武装思想,与时俱进,太重要了。

会后,李尔重同志带领宣传部的同志们,每天起早贪黑,奔走于大江南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把人员分成若干小组,一个一个单位跑,分别找干部和群众交谈,了解干部情况,分析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李尔重同志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工作表现,他决定开办马列主义政治夜校,举办各级各类理论培训班。他的主张获得市委批准和支持。

李尔重同志很快把马列主义政治夜校和理论培训班建立起来,根据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从实际出发,把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班。李尔重同志和张平化、吴德峰、谢邦治等市委领导亲自给学员讲课,授课内容有《政治常识读本》《论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尔重同志与家人合影

李尔重同志性格温文尔雅,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他讲课富有哲理,把复杂的问题运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做到深入浅出,易听、易懂、易记。现在一些老同志回忆说,听李尔重同志讲课,就像交心谈心,倍感亲切,终身难忘。

在组织干部理论学习时,李尔重同志采取多种学习方式和方法。他要求学员把理论学习与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密切联系群众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工作作风相结合。这三个结合,走群众路线摆在首位。学习方法即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为了了解和检查干部的学习效果,李尔重同志定期安排集体讨论,分组进行,谈学习心得体会,开展同志式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者坦诚指出被批评同志的缺点错误,不留情面,实话实说。受到批评的同志,决不遮遮掩掩,护短护痛,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同志对自己的关怀、

信任和爱护。

通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教育,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居功自傲、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大大改观。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投身到紧张又繁忙的恢复生产与发展经济的建设中。

我问李尔重:“那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有没有发生过顶牛的现象呢?”

“我没有看到过。”他肯定地回答我。他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受到批评的同志,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谁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多年以来形成了这样的良好风气。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这样磨砺成长起来的。

### 随随和和话春秋

1982年,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建立(后改为党史研究室),李尔重同志很重视,很关心。单位召开党史工作会议,或开老领导、老同志座谈会,家住武昌的李尔重同志不管多忙,也挤出时间赶来汉口参加,他每会必到,到会必讲。他说,党的光辉斗争历史,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带着血染的风采。用党的斗争历史资政育人,为改革开放服务,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不光这样说,还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修史。他把在汉工作期间收集和珍藏的史料,毫无保留地赠予市委党史研究室。他所提供的党史资料,有他当年在汉工作的工作手册、史料和报刊杂志、图书等。当我们细细翻阅这些资料时,心底便涌起一股感激的热流,一股深深的感动潮头。

我是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名普通的党史工作者,为了写好地方党史,四处奔走,一次次访问李尔重、宋侃夫、刘惠农、谢滋群、黎智等市委、市政府老领导和老同志。一天,我又专程前往武昌李尔重同志的家,请教他武汉地方党史该怎么写。他随和地对我说,党的斗争历史是客观的,任何人

不能歪曲、杜撰、篡改历史。他说,作为党史工作者,修史应忠实于史实,如实地把历史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后来是什么结果准确地、完整地表述出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司马迁修《史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是典范。

我想了想又问:“写史忠于史实,但是否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提炼,使之升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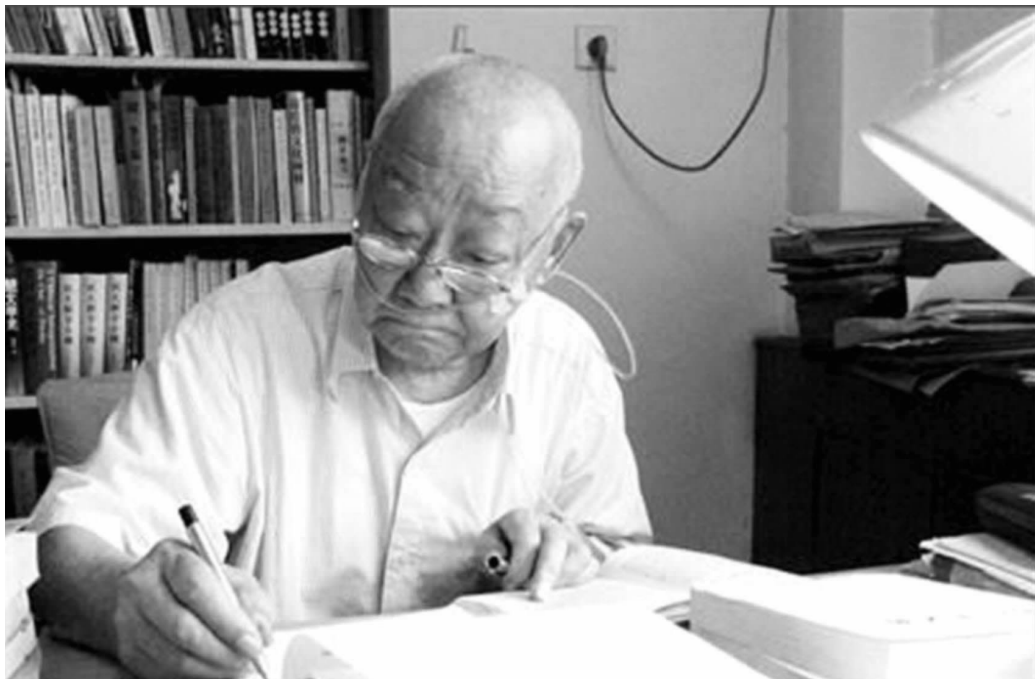
“不可!”他决断地说,“修史与文学创作有别,文学创作可以虚构故事情节,虚拟人物,写史则不能。”

当我问到1952年武汉发生“纪凯夫事件”该怎么写时,李尔重同志沉吟片刻说:“当时我在武汉市委工作,纪凯夫事件我清楚。”他端起茶几上的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水,轻轻放下杯子,接着说:“怎么写?我认为,一是实事求是,原原本本还原历史面貌;二是因纪凯夫事件受到处分的同志,后来都陆续恢复了工作;三是直到现在还有的同志没想通,这也是事实。”

返回单位之后,我仔细看了和李尔重同志交谈的记录,细心琢磨李尔重同志谈话的精神,心中有数了,于是执笔写了《纪凯夫事件始末》一文,送给一些老同志审阅,都说蛮好。说句心底话,我非常感激李尔重同志对我的指教。

此后,我在征集、编研武汉地方党史时,遇到过许多疑难问题,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各项事业,在三个“大办”的思想指导下,浮夸风盛行,土高炉一天生产钢铁万吨,一亩地产稻谷万斤,大放钢铁粮食“卫星”。人民公社居然办到城里来,大江南北两岸,武昌人带队来汉口吃食堂,汉口人率众到武昌吃大锅饭,大家放开肚皮吃,吃了还带走,结果

造成后来没有吃的、喝的。又如反对右派分子斗争、武汉“七二〇”事件,等等。这又该怎么写?这些专题政策性很强。带着这些问题,我又前往武昌请教李尔重老领导。



李尔重同志

当我坐下来把上述问题一一说完之后,李尔重同志沉思了一下,随和地对我说:“我们是唯物论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该肯定的,应加以肯定;该否定的,必须否定。这是修史的原则。”他停顿一下说,“那个大跃进年代,武汉搞了二百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必须看到,搞那二百个项目,对后来的工业建设起了一定作用,好的方面就肯定嘛。”他说到这里稍停,接着说,“1957年反对右派的斗争,我们确实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伤害了同志,好在‘文革’后彻底平反了,纠正了错误。”说到武汉“七二〇”事件,他说,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文革”结束后,中央宣布平反,作了结论。至于怎么写?他说,应宜粗不宜细,不要带倾向性。这样写,各界人士无话可说。

李尔重同志对我们党史工作者,如此亲切关怀和热心指导,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

### 耿耿忠心照日月

1995年,我写了一部《风雨人生》书稿,送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决定敬请老书记李尔重为本书作序,于是我事先给他的秘书李丹打电话,问老领导是否愿意作序,很快李秘书回了电话,说老首长答应作序,叫我把书稿带上到家里来。

按电话约定的时间,我带上书稿前往武昌李尔重同志的家。我真诚地说:“老书记,真对不起,又打扰您了。”他说不要紧,别客气,指指客厅的沙发叫我坐下,有话慢慢说。

我坐下来,为了不耽误李尔重同志更多的写作时间,我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我这部书稿的内容,即准备告辞。他说留下书稿吧,我看过之后再与你电话联系。

两周之后,我接到李丹秘书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老领导已经作好序,叫我去

取。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很高兴。

又按电话里约定的时间,我和党史办的同事张子善同志一起前往武昌,到了老书记的家门口,李秘书把我们引进客厅,李尔重同志笑对我们说:“来啦!请坐。”说完把手里拿着的书稿和已写好的序递给我,随和地说:“书稿写得不错,读后挺感人的,是一本好书。”我感激道:“多谢老领导鼓励。”他朝我们扬扬手让我们坐下。

一如既往,李尔重同志待人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人感到很亲切,无拘无束,心情舒畅。他坐下来和我们促膝谈心,从党史为现实服务谈到武汉经济建设,从改革开放谈到复兴中华民族,他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好啊,给国家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担当、有奔头、有希望。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改变了整个中国!”我觉察到老书记的心情特别好,满面春光,眉宇间显露出愉悦和兴奋。

他接着说,“我不是说一切都千好万好,我们还有不尽如人意的的问题。”他告诉我们,武汉有家大商场股票上市,悄悄给他送来一些原始股,每股一元,该商场股票上市不久,每股上涨24元。他说古人尚能做到“临财毋苟得”,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他叫秘书把这些干股退了回去。他说:“一个干部,要想清清白白做人,就不能贪,贪了,人心就会变黑。”

接着,他对我们说,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发动群众大打小老虎、中老虎、大老虎,打得他们无处藏身,自那以后,我们的干部队伍好了好些年头。他感叹道:“毛主席说得好啊,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扫帚一扫,那些脏东西就被扫掉了,清除了。”

我们静静地看着他,默默地倾听他说话,他对党和人民那片赤胆忠心,深深感动我们。我们深切地感到,老书记多么希望我们的干部,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办事,洁身自好,两袖清风。这便是他的心襟,他的殷切期望。

看到眼前这位抗日战争打过鬼子兵,解放战争负过伤,社会主义建设流过汗的老革命,虽已是耄耋之年,仍如此矢志家国,忧国忧民,我们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此后,我和本单位的李彬同志一起,先后两次专程前往武昌看望老领导,顺便把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雨人生》和武大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家在武汉》两本图书送给他,他接过书本连声说:“谢谢!谢谢!”

老书记走了,他生为国家,死为人民,他的洋洋正气和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为了悼念他、缅怀他,我在这里撰写这篇短文,寄托哀思!

(本文写于2014年)

◇李 乔

## 当年我“跑”新闻

在浩浩荡荡的记者队伍里，我紧张而愉快地行进了二十多年。闲暇之余，回想往事，记忆犹新。有心记下几件，以飨读者。

### 武昌县边界采访行

1988年11月8日清晨，我带着总编开的介绍信、武昌县地图、小打气筒和一个浅蓝色的旅行背包，骑上26型永久自行车，迎着初冬的朝阳，踏上了单车“武昌县边界采访行”的征程。说是单车，其实沿途有不少乡镇干部接应。

8点到达了大桥镇。此时镇广播站长卢成汉已等候在镇门口。我们驱车来到大桥镇最北端的王家湾，开始按地图上的县界自西向东采访。翻开当年11月8日的日记，有这样几段记载：“从郑店同心看洪山青菱乡境内，只见果树成排成行，葡萄架装饰得像公园，很有一点现代农业基地的气

派。”“在大桥的边界潘家湾附近，由于地貌有变与地图不符，我们迷了路，在田埂上转了近一小时，最后走出‘迷魂阵’。上了大路，过野湖坝，到杨家咀至纸金公路。这条路高低不平，上上下下，自行车震得发响，双手震得发麻。”“到余岭，我们发现一个小卖部，花了3.98元，买了一个罐头、一包饼干、两瓶汽水，解了渴，填了一下饥饿的肚子，这就是午餐。此时已过2点。”

路途，我们随机采访。当时，秋收仍在进行，田野一派丰收景象。我们与刚卖完几百斤鲜菜的小伙子、与田里割晚稻的村妇、与稻场上脱粒的老汉交谈。谈粮食产量，谈家庭承包，谈农村双层经营。下午4点多，经过9小时的跋涉，我们到达金口镇。“边界采访行”的第一天过去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天能和未来的中国记者节联系在一起，真是极巧的巧合。

“边界采访行”有几段路程很艰难。

从法泗到河埗，沿边界走要过一片荒滩和两条长堤，枯竹海那条有2公里多，尽是“牛凼子”，不能骑车，我和法泗镇党办秘书叶应龙推着车子艰难地走了约一小时。

当年从舒安过梁子湖南北咀到大屋陈没有汽渡，过湖很难。在湖边村的老支书和小投递员王孝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木船。记得我登上木船，放倒自行车，回首再望南咀时，岸边只有小投递员孤独的身影，突生一种苍凉之感，不禁黯然泪下。

到豹澥新店采访，老天忽然刮起6级北风，我和副镇长刘叙胜、党办秘书付乐兵顶风北进，几次斗不过大风下了车，只能推车前行。在县境最北端新店村，我们在菜地里采访了种菜能手袁世锦。“文革”间，老菜农因菜种得好，积攒了3000元钱，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的反面典型，脖子上套个纸做的大铜钱，受八县农民批判。改革开放后，他重操旧业，菜越种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篇报道很快被武汉电台采用。

最后一天采访，从豹澥出发，过流芳，到纸坊，行程远，路况差，人也疲惫，着实体验到了单车采访的艰难。

从大舒村西头穿过汤逊湖，水中仅有不足一米宽的过湖矮坝，印象中的这段路，杂草丛生，坑坑洼洼。湖对面人烟稀少，荒凉无比，即使仔细地对照地图也难找到准确的路。自行车只能推行，湖水与窄坝齐高，稍不留意可能掉到湖里。

过汤逊湖之后，地图完全失去了作用，正在施工的江夏大道，尘土飞扬，推土机轰鸣，四周除了杂草就是一望无际的丘陵。好不容易走到当年的(原生态)庙山，山南有两间茅草房，门口还有几棵大树，我停下自行车，在房前的木凳上休息了一会儿，问明

了路，又继续前行。沿着正在修建的江夏大道的土路基，颠簸地骑着自行车。下午5点左右，终于到达纸坊。

在这次单车采访中，为了及时报道新闻，常常边采访边赶路，当晚写稿，清早到邮局发稿。县广播站几乎每天收到我的一篇稿件，并以“本站记者边界长途采访发回来的消息”为电头，及时播出。这次采访的第一篇稿件《金口街小商品市场开业》，很快被武汉电台新闻联播采用，同事们戏称“旗开得胜”。采访半月里，领导和同行可以从广播稿里判断我到达了什么地方。可几次打电话，都没接上头，我正在乡间采访。

在这次边界采访中，我到达了与嘉鱼接壤的双窑村、金水河畔的新墩村、新河口旁的渔业村、斧头湖畔的双洲村、与咸宁大冶交界的刘均堡村、梁子湖岸边的祝家庙村、南咀大屋黎湾、位于牛山湖与梁子后湖之间的升华村、县界最北端的新店村、洪山区附近的茅店村、汤逊湖畔的庙山村等等，涉及大桥、金口、范湖、法泗、河埗、贺站、湖泗、舒安、大屋陈、龙泉、豹澥、流芳等乡镇。

11月23日，我回到纸坊，圆满完成“武昌县边界采访行”计划。这次长途采访，历时15天，行程736公里，写稿12篇，被上级新闻单位采用三篇消息和通讯。武汉电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次边界单车采访行。《武昌报》12月10日刊登了“女记者李乔骑车采访六乡七镇”的简讯，随后，又辟专栏登载了长途采访采写的通讯。

这次采访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锤炼了深入农村采访的作风，提高了快写快发的业务技能，使我基本上实现了从一个机关干部到记者的转变。

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11月

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我翻开当年的报纸和采访笔记,欣慰地证实了这一巧合。因为在1988年的这一天,我启程做了一件基层记者应该做又很难做的事。

### 人大新闻缘

我从咸宁地区行政公署广播电视局机关调入武昌电视台不久,被抽派到县人大换届选举宣传组,从此,和人大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86年到1992年,连续三届县人大换届选举,我分别以电视记者、广播记者、报社记者的身份,抽派到宣传组。6年多时间,经历了做三大传统媒体记者的过程,用不同的新闻传媒方式报道县人大换届选举。这尽管是一种巧合,却让我经常回味,难以忘怀。

在此期间,随着采访的深入,人代会知识的不断丰富,我采写的人大新闻开始在市级新闻媒体播出或刊发。新闻稿件的质量也开始由量变走向质变。1993年5月29日,在武汉市首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颁奖仪式上,我的一篇通讯《换届选举深入人心》获得二等奖。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岩为我颁奖,亲手递给我获奖证书和景泰蓝奖杯。

在一大堆采访本中,我找到了这篇获奖作品的采访笔记,上面记录着1992年11月18日在金水乡勤建村(第20小选区、第5大选区)、横堤村(第21小选区、第5大选区)和海口村的采访内容。当时,和县乡人大干部一起,在村民家中,在选民榜前,在田埂旁,在村头上,整整一天的外围采访和直接采访,得到了许多关于在换届选举中村民民主意识增强的鲜活素材。为了得到

真实的素材,我和乡村干部打着手电筒看选民榜,走村串户采访选民。第二天,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换届选举宣传组的办公室里,经过精心提炼,写出了三个新闻小故事组成的通讯《换届选举,在选民心中……》。这篇通讯寄出后,首先在市人大常委会主办的《武汉人大》换届选举专刊二版刊登。12月7日,又刊登在《长江日报》二版,标题被编辑改为《换届选举深入人心》,值得记忆的是,编辑在这篇通讯的标题下,署名为“武昌报记者李乔”,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本报社记者署名于《长江日报》上。

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鲁久万、区委宣传部长邱天金,还有换届选举宣传组长熊先木,我们一起到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大厅参加区县换届选举总结表彰会暨首届武汉市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颁奖仪式。在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在主席台上宣读了我获奖的通讯。获奖后,我也听到县乡人大领导说,颁奖前夕,市人大常委会专门派人到金水乡选民家中,调查核实这篇新闻通讯的真实性。当时听起来感觉很自然,现在回想起来,却感到难能可贵!

武汉市首届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颁奖仪式通过市级各报纸、电台、电视台刊登、播出,获奖篇目和获奖者名单也在1993年5月30日《长江日报》二版上登载。同时,我和当年的换届选举宣传组长熊先木获得1992~1993年武汉市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此后,市人大常委会由三年换届改为五年换届。1995年武昌县拆县建区。我也结束了参加人大换届选举宣传组的经历,开始经常性地采写报道人大新闻,努力地宣传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001年和2002年区人大组织“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区有关单位及三大媒体都派员参加,《江夏报》有三名记者,我是其中一名。采访团接过区人大副主任计蕊华的授旗,并在她的带领下,有时冒着酷暑,有时顶着瓢泼大雨,轻车简从地采访于粉尘扑面的工厂、出现污染的湖畔、植被被破坏的山麓、油烟袅袅的餐馆厨房,采访团频频发稿,极大地提高了“环保世纪行”的影响力和震撼力。

在“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中,我的新闻作品两次获奖。2001年采写的《纸坊三师附小在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2002年采写的《油烟扰民投诉多,齐心整治净环境》分别获得江夏区环保世纪行“好新闻”二等奖。

### 区长卖瓜

1999年,经过九八抗洪的考验,我无论在思想上、作风上,还是在新闻业务上都有了实实在在的进步。

当年7月1日下午5时,我接到报社领导交给的采访任务,大概内容是:在区长的努力帮助下,滞销的土地堂西瓜有70万公斤明天卖到武汉。这是一条好新闻线索!社领导临下班时嘱咐,要尽快采,提前写,力争明早拿出稿件。当晚,我用电话找到了土地堂乡党委书记刘成贵,采到了土地堂乡干部下村组做好卖瓜准备的素材,写出了500多字的小通讯《区长卖瓜》。第二天清早把稿件交给值班领导后,我便带着相机乘车到土地堂采访一百多辆汽车运西瓜到武汉的场面。

由于现场采访的素材与事前采访的素材一致,稿件不必变动,于是在7月2日稿

件准时发往《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又由于稿件主体突出,时效性强,7月3日《区长卖瓜》在《长江日报》一版登出,《湖北日报》接着也以醒目的标题在武汉新闻版刊登。

《区长卖瓜》登出后,连续6次获奖:《长江日报》十二届通讯员好新闻一等奖、湖北新闻奖三等奖、湖北县市报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县市报好新闻二等奖、武汉女记协好新闻三等奖、《长江日报》年度好新闻三等奖。也是这一年,我冒雨在田间拍摄的一幅摄影作品《耐心传授》获得湖北县市报新闻摄影三等奖,同时得到在九八抗洪中写的消息《为嘉鱼灾民献爱心》获武汉女记协好新闻三等奖的证书,这也是我对九八抗洪的最好纪念。

尽管新闻奖重在精神鼓励,但在一年中能获8次奖,并且题材多样,的确让我终身难忘。



◇李志华(口述) 陈世高(整理)

## 抗战中的牛堤口中心税卡

我于1940年参加革命,先在湖北省应城县的区、乡工作,1943年调到牛堤口中心税卡任卡长,直至1946年新四军五师突围北上时才结束。

日本侵华,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应城市)于1938年10月沦陷,国民党县长鲍佛田弃城逃跑,应城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开展如火如荼的抗日游击战争。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上半年,行政人员和部队的给养,是由膏盐矿商募集“抗日乐捐”解决的。但是靠募捐并非长远之计,从1939年下半年起,在杨家河、两河口、牛堤口建立三个税务所,开始征税,所收税款为新四军五师和应城抗日党政军供给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牛堤口位于湖北省应城县南部湖区,是大富水(即县河)和天门河交汇处,牛堤口也是天门河、大富水与长江、汉水往来船只的必经之地。当时交通不便,以水运为主,这里也是江汉平原和应城县盛产的食盐、石膏、芦苇、农副土特产品和工业品运销的必经之地,这里的税源大而集中,因此,首先在此成立税务所,后于1944年改为中心税卡,下设牛堤口、木梅、郭老湾三个分卡,全卡四十多人,配备有船只,以芦苇——青纱帐为天然屏障,在此征收行商税。由于是应城县的主要财源,也是当时党政军群后勤供应的重要保障,所以上级对税收工作十分重视,每个税干配有短枪,上级按时派一个排的部队来提取税款。1945年日寇投降后,上级派一个排的手枪队,住

在税卡,保卫税卡,护送税款上解。

抗战时期的牛堤口是个游击区,在这里做税务工作异常艰苦。当时税卡不仅没有高楼大厦办公室和安定的工作环境,而且根本不能站在一个地方收税,只能收一笔税换一个地方,亦无固定的住处,以船为家,出没在芦苇中;或住农家,时而一个晚上要住几个湾子,才能歇息片刻。东躲西藏,让敌人找不着,日晒夜露,风餐露宿,盛夏炎热蚊子特别多,叮咬厉害,隆冬风雪严寒异常,过着饥一餐饱一餐的生活,收税、生活、居住都要同敌人打游击。

征税是项新工作。刚开始收税,商人尚无向我方交税的认识和习惯,因而拒绝交税,只能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工作,常向商人们讲“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支援抗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费尽唇舌,减少阻力,让商人们积极交税。

当时税务干部和党政军群工作人员一样是供给制,待遇都很低,每人每天大米 1

斤、小菜 1 斤半、食油五钱、盐三钱,每人每月发津贴边币 5 角,作为买牙刷、牙粉、毛巾、肥皂之用,有时经济困难不能兑现。因为税务工作的特殊性,热冷两季的衣服按标准折钱发给个人,缝制老百姓服装。税务干部同党政军群工作人员一样,不但不能养家糊口,还要家中支援钱和物。

尤其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征税,面临敌情严峻的恶劣环境,每天皆是险象环生。牛堤口距离临江口、黄滩镇、应城县城关只有 5~20 华里,三处都驻有日军和伪军,还有敌经济稽查队,敌人视牛堤口中心税卡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刻刻都企图摧毁我牛堤口中心税卡,经常袭击、捕杀我税务干部,抢我税款,断我财源,破坏抗战。而税卡在日寇投降前无专门的武装保卫,虽然每人都配有短枪,但人少分散,自卫能力弱,地盘小,迂回有限,又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放弃收税,只能敌来我走,敌去我归,时时刻刻皆在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之中,有时一天要逃避敌人几次。



抗战时期,行进在湖区的新四军部队

1944 年春季的一天,税卡的同志在魏湾收税,应城县的谍报队和临江伪乡公所敌伪人员化装成便衣,偷袭税卡。陈九斤上岸看敌情,发现敌人已经到了魏湾北头,另一股敌人也到了魏湾的南头,陈九斤立即报告,全卡同志迅速上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朝天鹅方向划去,钻进芦苇丛林,消失在茫茫青纱帐之中,此次被敌人抢走5万元税款。1944年秋天,日伪便衣队混在砍柴的农民中,基干队长发现了用暗号喊我们快跑,我们五个人出门与2个敌人相遇,敌人不敢贸然下手,在群众的拥护下又安然脱险。

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八十余人从应城出发,到牛堤口天未亮,睡在堤上,像守株待兔一样,等待税卡工作人员的到来,再有四十多个敌人已包围了魏湾、陈湾,搜寻税卡工作人员,企图一网打尽,刚好那天税卡工作人员全部住在沈家铺,这样与敌人周旋,敌人一无所获,捕空而归。

那时,人们都说税务干部是提着脑袋收税,这一点也不假。在抗日战争中,应城县壮烈牺牲的税收干部有二十多人,其中有股长5人、卡长2人、稽查长1人、所长2人、会计1人、税收员10人。1945年6月的一天,敌人藏在商船中,到木梅分卡靠岸,佯装交税,突然出现在执行任务的分卡卡长戴发豪同志面前,税卡同志拔腿就跑,敌人开枪打伤了戴发豪同志的腿,他带伤钻进了芦苇中,敌人赶去杀害了他,他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为革命的税收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掩埋了烈士的尸体,擦净身上的血迹,以前赴后继的精神,继续坚定的战斗在税务战线上。

为了征税,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扎根于群众之中,每个晚上都是轮换地方居住,做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经常参加劳动,帮群众搞生产,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受到群众拥护与欢迎。这里农村有地下共产党的支部和各种群众组织,我们与群众关系好,他们为税卡站岗放哨,一有敌情,就跟我们报信,这样,税卡才得以立足。那时,税收干部如果贪污

腐化,大吃大喝,就会严重脱离群众,不但征不到税,敌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我们捉去杀头,我们也会被群众用乱棍打死。

虽然,当时战争环境极为险恶,税务工作人员辛苦异常,经常遭遇敌人的袭击,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战场上,但是大家胸怀伟大理想,靠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不怕苦不怕死,不屈不挠,机智勇敢地执行任务,在当地、乡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大批的税款一批批武装押解,送往上级部门,保障了前方的供给,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第五师打击日本鬼子,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大家都感到十分自豪与欣慰。现在想起,仍然很激动,这种无所畏惧,艰苦奋斗的牺牲精神,至今也是应该提倡和赞颂的。

◇甘超逊

## 陈友谅墓修缮史小考

陈友谅墓在武昌蛇山。这位元朝末年乱世中建立大汉政权的枭雄，悄然葬身于此。

踏石阶而上，迎面是高大的四柱三间石牌坊，以汉隶正面横书“江汉先英”，背面则是“三楚雄风”。上石阶后，可见褐红色的圆形墓冢，墓前是2米多高的水泥镶嵌的麻石墓碑，碑上只“大汉陈友谅墓”六个篆刻字。墓后有两米宽的水泥平台，左侧有一无名亭，亭下不远处有陈定一烈士就义纪念碑；右侧是“陈友谅生平事略”碑。墓地面积不大，背靠长江大桥引桥，面对鳞次栉比的居民楼，掩映于初秋的桑树、枫柳荫中。

在蛇山畔的陈友谅墓地，我注意留心墓侧的石碑，它们是不同的时期陈友谅墓修缮情况的反映；同时，又结合相关史料、地方志，钩沉陈友谅墓的修缮情况，尝试考察这位失败的英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接受史。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的夏天，在鄱阳湖水战中陈友谅军一败再败，被困湖口。朱元璋派人送信劝降，陈友谅不从，但围困日久，缺粮少食，只能带残兵冒死突围。《明史》记载了陈友谅败亡的经过：

友谅得书忿恚，不报。久之乏食，突围出湖口。诸将自上流邀击之，大战泾江口。汉军且斗且走，日暮犹不解。友谅从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捻，骤中流矢，贯睛及颅死。军大溃，太子善儿被执。太尉张定边夜挟友谅次子理，载其尸遁还武昌。

在乱军中，陈友谅被乱箭从眼睛射穿脑袋，尸首被太尉张定边连夜用船载回武昌。陈友谅次子陈理即位称帝，改年号为德寿，武昌实际上成为了大汉政权的都城。眼见最强大的对手大势已去，朱元璋当然会乘胜追击，“是冬，太祖亲征武昌。明年二月再亲征。”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

陈理出降，由陈友谅建立的大汉政权历四年而亡。

之所以不殚其烦地引用正史中关于陈友谅之死的记载，是想说明一个推测——武汉蛇山的这座陈友谅墓应该是陈友谅的葬身之墓。我查资料时看到，福建南平九峰山上亦有一座陈友谅墓，但考诸史实：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末陈友谅败死，至张定边趁夜携陈友谅遗体与陈理回武昌，再到当年冬天朱元璋率军攻打武昌，这之间至多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忙于登基、应付朱元璋攻势的陈理，似乎不可能将陈友谅不远千里迁葬在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福建南平，而就近葬在武昌的蛇山应该是最合理的。也有资料说蛇山的这座陈友谅墓是衣冠冢，但据清同治《江夏县志》记载：

“陈友谅墓，在城内臬司后黄鹄山，或曰疑冢也。明太祖屡祭，手书‘人修天定’四字于壤所。”可见，蛇山的陈友谅墓为衣冠冢只是流传的一种说法，且并非主流。作为同一时期的人物，贵为帝王之尊的朱元璋不至于找不到陈友谅葬身之墓；何况祭奠这位昔日强劲的对手，朱元璋大概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意，更多还是山河鼎定的矜豪，这样的胜利者心态应该不会对着一座空空的衣冠冢屡屡抒发。

陈友谅在后世的身份颇有些尴尬。作为曾与朱元璋争雄天下并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大汉皇帝，在明代必然会被打入另册。身为反抗蒙元暴政起义军中最坚决一支的领袖，陈友谅必然会引起同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的警惕，清同治《江夏县



陈友谅墓前的四柱三间石牌坊，正面横书“江汉先英”，背面是“三楚雄风”

志》中屡屡以“红巾贼”视之。兼之在清代，湖北按察使司署在武昌黄鹄山（今蛇山）建乃园以作后花园，占地数十亩，陈墓正在园中。处在官家园林，游人不能随意入内，陈友谅墓自然就更少人知了。

陈友谅墓的发现其实很偶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湖北臬署寄居读书的万耀煌、耿仲钊等人在蛇山乃园游玩时发现此墓。辛亥革命胜利后，湖北省内务司即议请整修陈友谅墓，主其事的是时任省内务司司长饶汉祥。饶汉祥（1883~1927年）是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民国元年（1912年）11月，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任内务司长，次年9月任民政长。饶氏擅长文学，“善写骈体文章，喜用僻典，各省军政当局纷纷模仿，形成民国初期的一种文风”，陈友谅墓石碑上“大

汉陈友谅墓”及《大汉皇帝陈友谅墓碑铭》即是出自他的手笔,可惜《大汉皇帝陈友谅墓碑铭》在今天陈友谅墓侧已不存。此次陈友谅墓修整的情况,金光宇《江陵归途琐记》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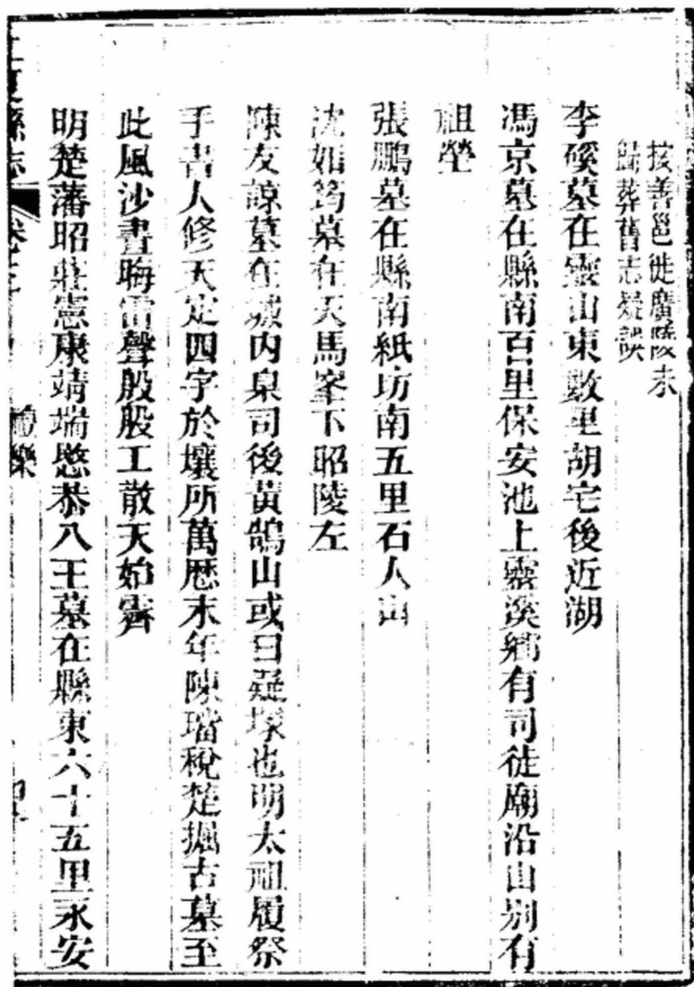
披荆除棘,惨淡经营,募建墓碑,文曰“大汉陈友谅墓”。工程浩大,所费不赀。前有二亭,为六角形,左曰“英雄盖代”,右曰“江汉炳灵”。石级之下,并植石坊。气象沉雄,令人肃然起敬。寻绎碑中纪事,寓感喟之意甚深。

饶汉祥之子饶藕林回忆:“陈墓修好后,先父还在墓旁修建一座小祠,以备祭祀之用,并题诗一首,诗曰:‘三户亡秦后,昌

图再不终。岂伊关地气?盖亦体天衷?虎阜吴陵壮,龙川汉寝雄。玉堂陈奠上,犹惜大王风。’”但吴天放《记新都之行》一文记载,彼时的湖北省内务司还计划在陈友谅墓侧修祠以作纪念,最终未果。无论是否建成陈友谅祠,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修整陈友谅墓的工程浩大,修墓、建亭、树碑,用隆重来形容亦不为过。

那么,为什么已逝去五百多年的陈友谅会突然这般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呢?饶汉祥曾道及其中缘由,“我父念陈友谅是驱元复汉的革命志士,虽然失败,但不能任其淹没,使后人无知无闻。”——“驱元复汉的革命志士”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清末

革命党人武装反抗清王朝,一个重要的口号便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朱元璋、陈友谅等人反抗元朝暴政的事迹与其立场具有一致性。一个显著的事例就是,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以明太祖兴兵逐元,恢复汉山河,实于汉族有功,且为民族主义者之先导”,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并郑重其事地发表了《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两个文告。无论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寻有利的精神资源,以证明推翻清王朝的合理性;还是借历史事迹激起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形成有利的革命舆论氛围,“为民族主义者之先导”无疑是革命党人在朱元璋、陈友谅身上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精神”因素的投射。陈友谅与朱元璋这两位敌手,在五百多年后实现了某种人为的“和解”,陈虽没有得到如朱一般全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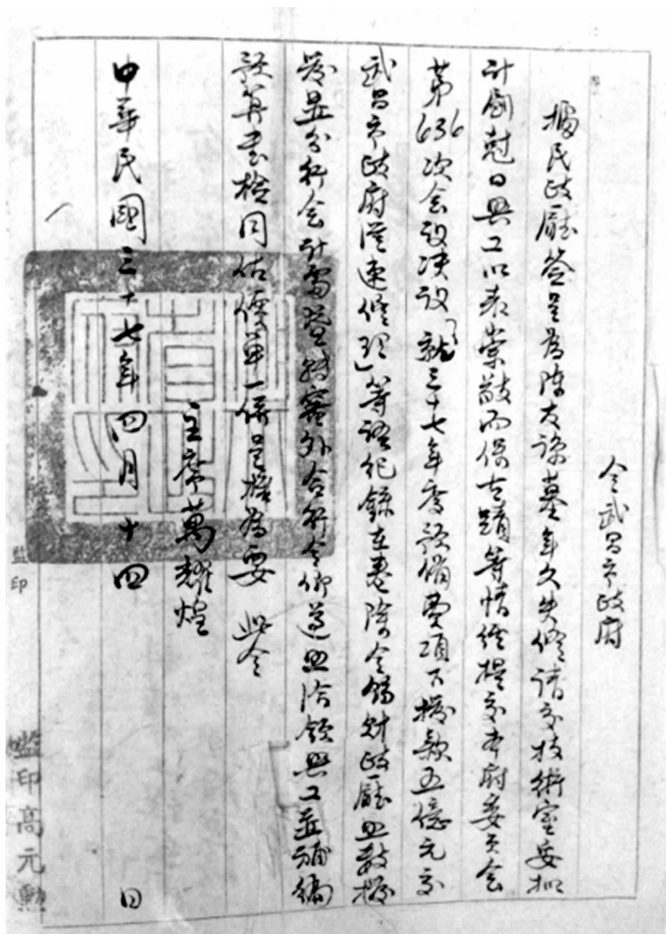


清同治《江夏县志》中关于陈友谅墓的相关记载

的表彰,但至少在他的家乡湖北顺理成章地成为“元末革命伟人”,受到了高度的尊崇。

除民国二年(1913年)这一次对陈友谅墓较为完善的整修之外,民国政府对陈友谅墓的保护一直较为重视,以后还有大大小小数次的整修。武汉市档案馆中藏有《武昌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及陈友谅坟墓建筑等的房屋估价表》(档号:LS18-10-458)、《武昌车辆厂征用本地市价、陈友谅修墓经费及朱竹玉领恤金》(档号:LS18-10-4367)等档案,分别是不同时期民国政府对陈友谅墓修缮的见证。

民国十二年(1923年)退伍军官“八大将军团”私人集资,在蛇山脚下大成路边的乃园盖起汉升大戏院及共和游艺社。1928年完工了一座孙中山先生纪念碑,门口立起“辛亥武昌首义纪念坊”的牌坊,这是最早私人建立的小首义公园。但辛亥伤兵寄居园内,依赖出租场地,设铺摆摊,形成了以卖茶、唱戏为主体的娱乐场,公园景色全失。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代建设厅长李书城及接任的李范一延请卢立群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实施蛇山上的各项工程计划,并改造山下的乃园,揭开了蛇山大首义公园(初名武昌公园)的建设序幕。《武昌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及陈友谅坟墓建筑等的房屋估价表》中保存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卢立群以湖北省武昌公园管理处管理员身份提交的《首义公园整理办法》,其中“工程事项”的第二条:“由黄鹤楼品芳照相馆右侧斜趋陈友谅墓前添筑缓坡度宽二公尺之路一条。”虽然仅此一条,但单独提出在陈友



武汉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三十七年四月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所签关于拨款修理陈友谅墓的政府令

谅墓前添筑缓坡路,可见对陈墓的维护一直在政府的视野当中。

《武昌车辆厂征用本地市价、陈友谅修墓经费及朱竹玉领恤金》中留存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湖北省拨专款五亿元交武昌市政府修理陈友谅墓的来往文件。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签署给武昌市政府的令全文如下:

令武昌市政府

据民政厅签呈,为陈友谅墓年久失修,请交技术室妥拟计划,克日兴工,以表崇敬而保古迹等情。经提交本府委员会第636次会议决议“就三十七年度预备费项下,拨款五亿元交武昌市政府从速修理”等语(记录)在卷,除令飭财政厅照数拨发并分

行会计处暨转审外，合行令仰遵照洽领兴工，并补编预算书，检同估价单一并呈核为要。此令。

主席万耀煌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即使是在物价高昂、货币极度贬值的1948年，五亿元也不啻是一笔巨款，虽然不曾见陈友谅墓此次维修的图纸或照片，但可据此推测维修规模应该不小。湖北省政府批准维修陈友谅墓的原因也在这份令中表露，即“以表崇敬而保古迹等情”，这仍是自辛亥以来对陈友谅民族主义一面表彰的延续。万耀煌(1891~1977年)是湖北黄冈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辞职，这份政府令是他辞职前签署的最后一批文件之一。万氏应该没来得及看到修整后的陈友谅墓，而当初清末陈友谅墓亦是他发现的。

1949年江山鼎革，新中国政府对陈友谅墓的修缮则稍有波折，现结合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将其修缮历史简述如下：

1956年11月15日，湖北省政府将陈友谅墓列入第一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民国陈友谅墓的基础上给予整修，并立“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碑于墓侧。对陈友谅墓的修整是立足于对陈友谅的评价之上，1949年后在大陆主导的是革命史学对“反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农民起义成为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时，陈友谅在官方的评定中会被定位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如同1960年吴晗说的：“陈友谅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反对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于是，陈友谅墓在1956年被公布为第一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再次修整，就在情理之中了。

与其他许多历史遗迹的命运一般，在

“文革”期间陈友谅墓堆被毁。据《关于武汉市(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档号:69-1-638)记载，1973年4月1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将陈友谅墓剔除出武昌区省级古代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备注的理由是“墓已挖，不再保



陈友谅墓右侧的“陈友谅生平事略”碑，1998年6月立，碑文由皮明麻撰、张少华书



护”。可见,陈友谅墓在“文革”被彻底毁坏,甚至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亦被取消。

陈友谅墓的再次重修,已是改革开放后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政府对陈友谅墓重新修整。1993年9月,武汉市政府发布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档号:98-3-133),依据该文件陈友谅墓的保护范围扩大为“东、西面分别至陈友谅墓墓碑以东、以西各五十米;北面至长江大桥道路规划红线;南面至牌坊以南二十米”。1995年1月,武汉市文物管理文物保护处制定了《陈友谅墓维修方案》(档号:194-2-196),从“墓园现为群众休闲场所,但较荒乱,建(构)筑物破损严重,石砌墓道多被毁,两碑亭一毁一朽,碑亦无存,墓冢及挡土墙破损,需重砌和修整”的记述,可知此时陈墓已破损严重。该方案从维修和修复墓道、修整平台、修整挡土墙、牌坊维修、修复碑亭、整治环境及附带修整陈定一烈士就义纪念碑七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划,要求“该墓陵维修后要达到整齐、肃穆而美观的效果”。

1998年6月,政府对陈友谅墓再次进行修缮,并增加了“陈友谅生平事略”碑石。碑文由皮明麻撰文、张少华书写,简要介绍了陈友谅的生平事迹。我读碑文时发现一处笔误——“友谅出身渔家,曾充县吏,原本姓谢,因入赘陈氏而易姓陈”,但据明初宋濂《平汉录》云:“陈友谅,沔阳人。本姓谢,祖千一,赘于陈,遂从其姓。父普才,黄蓬渔子也。”《明史》亦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可见陈友谅是因为其祖父入赘陈氏才易姓的。

以上便是陈友谅墓自民国至今的大致修缮情况。自1981年来,政府对陈友谅墓

的数次修整,逐渐开始从文物保护和文化教育的角度着眼,政治的因素逐渐削减而文化的因素开始彰显。我以为,比之与民国政府时期的强调于“驱元复汉的革命志士”“民族主义的先驱”,以及新中国前期立足于“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而修缮陈友谅墓,这方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有资料说,陈友谅墓是武汉市唯一的封建帝王陵墓,仔细一想,倒真是不假,虽然他只是割据一方的皇帝。一座历史名人陵墓的修缮史,是一段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证,哪怕他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应该要好好维护,正如梁启超所说“项羽、李密、陈友谅,时代不同,事业大致相同,都是遭遇强敌,遂致失败;这种失败的英雄可供我们凭吊的地方很多”。

离开陈友谅墓前,再看了一眼石牌坊上的“江汉先英”“三楚雄风”,觉得陈友谅是当得起这八个字的。

◇方 方(主 编)

## 你我的往事(十三)

### 我的穿鞋史

1963年9月的第一天,我们十几个从乡下来到城市读高中的穷家孩子,既无钱买鞋,也不习惯穿鞋,于是在上高中的第一节课打着赤脚进了教室。

课间校长巡视教室,见竟有十几个同学打着赤脚在上课,眉头一皱,二话没说转身离去。下课后,校长通知班主任,把我们十几个打赤脚上课的学生全部叫到校长办公室立正站好。校长非常严肃地大声训斥道:“你们这些同学简直是目无师长,不尊重老师,赤脚上课成何体统。今后任何人再也不准打赤脚上课了。”训完之后又命令我们马上回寝室穿上鞋再到教室上课。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打赤脚到教室上课了。

打赤脚,当然不是我们的本意。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老师的不尊重。

因为从读小学到初中毕业,除了冬天以外,我们都是打赤脚上学的。那时家里穷,无钱买鞋,一双土布鞋穿上脚以后要管好多年。我们这批打赤脚上课挨批评的学生,因为家庭特别困难,都是甲等助学金享受者。每月学校给我们发九元钱助学金,这在当时是最高的补助标准。而这九元钱,也只够每月的伙食费,星期天回乡下家里吃饭才能凭票退给我们三角钱。而家里也根本无钱给我们买鞋。由于贫穷和习惯,到了城里上学,又是大热天,叫我们穿鞋上课还真有点不自在。但自从校长批评我们以后,我们也只得老实地穿鞋上课。当时我只带了一双母亲做的土布鞋,是准备冬天穿和晚上洗脚后穿上的。只是光穿一双鞋又没有换洗的,只好星期天回家跟母亲好说歹说,找别人借了一元钱买了一双黄力士鞋。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从商店买的鞋。这两双鞋是破了

补,补了又穿,一直伴我度过了高中三年的求学生涯。

从读大学到参加工作,我都是穿着一双土布鞋。后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白浒公社任团委书记。我从每月36元的工资里面拿出4元钱,买了一双球鞋和一双猪皮鞋,这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正是“全国学大寨”高潮时期。当时的公社干部一年当中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在农民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穿球鞋是工作的需要。有一天回机关学习,我高高兴兴地穿着新买的猪皮鞋走进了会议室,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李定保同志看见我穿了双皮鞋,满脸不高兴。学习完后李书记讲话时不点名的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当上国家干部就忘了本,丢掉了艰苦朴素的老传统,好好的球鞋不穿,穿什么皮鞋,我把丑话说在先,今后公社机关干部一律不准穿皮鞋。”自此以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我这只穿过一次的猪皮鞋就一直放在柜子里,再也没有穿过。

(钱 耘)

### 做布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人人都穿布鞋,家家都自制布鞋。印象中老祖母做鞋的样子,至今仍鲜活地呈现在面前。

那时我家八口人,全部鞋子都出自老祖母之手。祖母纳鞋子的手艺十分精绝。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向她求艺者特多。无论是单鞋还是棉鞋,圆包头鞋还是绣花鞋,成人鞋或是“猫猫鞋”,都做得有型有款。

做布鞋的第一道工序是裱壳子。在此之前,先要熬面糊。用冷水将灰面(面粉)放在脸盆或锅里调匀,加热煮熟成浆糊。先将

面糊涂抹在一扇床铺板上,再将拆线后的大块旧衣片或旧床单裱裱在铺板上,做底层。然后再涂一层面糊,裱上裁剪衣服时剩余的零头碎角杂色新旧布料,如此重复,面上再裱上一层色块接近、面积稍大的旧布料,裱裱工序即告完成。

晾晒干透后,成了纳鞋底“壳子”。通常是三层布,有点像“三夹板”,卷起备用。

第二道工序是纳鞋底。在此之前,得先剪鞋样。一般家庭主妇都自建“鞋样库”,用牛皮纸或报纸将各种尺码、款式的鞋底、鞋面、绣花剪纸样等分类夹放在书本内储备。鞋底尺码选定后,将“壳子”依样剪下四张,重叠,以宽距粗针线初步缝合定位。再剪白布包底,针线就开始了千恩万情、密密点点的行程。

祖母纳鞋底姿势相当优雅,一针下去,借助中指上套着的顶针,直顶至没入针鼻,再到反面抽拔针线。偶尔针涩,还得借助针钳。针钳略似镊子,前部带钩,状如颈鸭。抽针后,来回拉扯着长长的索子线,嗖嗖有声。每纳一针,得将手指挽住线,咬牙使劲扯紧,在鞋底上留下一道浅坑。最经典的动作是磨针,不时将针尖在发际边一划拉。看那鞋底线道,虽是手工,却不逊于当今电脑编程。鞋底并不纳满,在前掌与后跟结合处,因不是着力点,留一处空白,那便是慧心的印证。

第三道工序是做鞋帮子(鞋面)。按所需鞋样将黑洋布剪成英文n形,与白布里衬上浆缝合,再做包围式缝合。鞋口部分还得滚口,一者美观,二者耐磨。出边的鞋底要滚(包)一道白边;不出边的,也可用刀切齐。

第四道工序是纳帮子。鞋底面部用米饭粘一层白布垫,将鞋帮与鞋底缝合,鞋就成型了。

最后工序是楦鞋。家里备有大大小小系列化楦头,一双鞋绱成后,就含一口水,往帮子四周均匀地喷湿,然后塞上鞋楦,再用楔子一楔,放在通风处晾干,定型。

别说是绱鞋了,就是复述一遍过程,就颇费一番唇舌,可见其做工之繁琐。

几十年后,蓦然间想起往日那轻便、透气、舒适、耐穿、养脚的布鞋,想起慈爱的老祖母,不禁怅然。

(胡全志)

### 订婚证

我与丈夫黄子明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是自己做主、自由恋爱。两家都是先通过照片观察确定,然后再以看电影的方式会面。电影院里漆黑一片,哪里看得清楚,直到散场亮灯后,才可以匆匆瞥见对方的背影。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清晰记得当时看的是原版英文影片《茶花女》。也许受到影片中那绵绵情意所感染,我这个少女的心扉,就在那个黑夜被打开了。

经过男女双方同意后,双方家长便开始筹划一个订婚仪式。像引进一个项目一样,签定类似协议书的订婚证。证书是民国时期印刷的,而纪元又是新中国实行的公元制,于是有了“中华民国一九五零年元月一日”字样。另外,证书上“缔结良缘、订成佳偶、志同道合……白头偕老、花好月圆……”等一大段文绉绉的良好祝词,以及见证我们的婚姻的相关人员的签名、印章,让人一看便知是旧时风物。

或许真要感谢那么多良好祝词的祈福,我与丈夫婚前尽管缺少接触,婚后五十年却恩恩爱爱,融洽无间。直到他三年前

去世,那张新婚照和订婚证,倒成了我寄托相思的最好什物。

(崔秀清)

### 结婚只用两百元

1960年,我是市直机关一个局的团委副书记,爱人是纱厂的工人。那个年代是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年代,我虽是一名副科级干部(当时市直各局下面只设科),拿的是办事员的工资47元,还要寄钱给在乡下的父母。故待我结婚时仅只有两百元的积蓄,这两百元又是怎样结婚的呢?看看下面所列清单就会一目了然了。

一、房子:在一个已住人的套间内分了一间不到14平方米的住房。那时几乎没有装修这个概念,只是打扫了一下卫生就算新房了。

二、家具:床(中铺)、书柜、凳子是我住集体宿舍使用的,通过办理借用手续搬到了新房,为了放置茶具临时找同屋借了一个圆桌。

三、用具:除买了一个闹钟外(是上班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上三班),茶具、锅、碗、盆、床上用品等有的是原住集体宿舍自己使用的,有的是爱人陪嫁带来的,炉子是自己做的。

四、服装:除用三十多元给爱人买了一件当时认为较好的上衣外,我自己穿的是平时所穿的较好的一套。

五、烟、酒、糖:因家不在武汉,花80元在老通城订了一桌酒席,主要是爱人在汉的亲友及家人,自己的亲友一个也未请。烟糖花了二十多元。

虽说如此,但婚礼还是相当隆重的,记得当时局小会议室张灯结彩,并由一位副

局长主持婚礼,机关很多同志都参加了。

爱人及其亲友也未用车接送,都是自己搭车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布置新房、订酒席、筹备安排婚礼都是由局办公室主任及同事代办的。可这些同事没有一个参加我在餐馆的婚宴,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十分内疚。我想这就是那个年代“同事之间如兄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缩影吧。

(李裕仿)

### 婚事的回顾

在三年困难期间结婚,物质条件是谈不上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当时结婚的物品是凭计划供给,由于国家物资十分匮乏,计划供给的东西非常有限。我在箱子底下找出了当时的结婚证。从它背面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供给的东西总共只有五样:一是布票,二是糖票,三是一对床架,四是两个热水瓶,五是一个脸盆。布票的数量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数量极少是肯定的。因为用这些布票买了被里就不能买衣服。我们是用它买了一床被里,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买衣服。婚礼那天,我爱人作为礼服的上衣,是用一件退了色的旧军衣染成的蓝棉袄。我穿的新娘装色彩比较艳丽,但也是用两件旧罩衣添加棉花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以旧翻新的。那时的所谓床架,跟现在的床架比,也不是一回事。不过是两个带了靠背的长椅子,中间必须搁上床板或棚床才能睡觉。因为当时供应的只有一对床架,我们用的绷床还是家里老人让出的。

谈到物质条件,不能不说说我们的新房。现在结婚的新房都是几室几厅,装修得漂漂亮亮。那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结婚时,机关没有宿舍分配给我们,只好在机

关内部挖潜力,把办公楼二楼半一个楼梯间腾了出来,安排我们作了新房。这间房的面积大约只有七八个平方米,里面放一张床和一个写字桌就满满当当了。这样的新房,虽然很小、很矮,也没有装修。可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崇尚节俭,人们都是重精神不重物质。住在里面,我们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相反,都感到十分的温馨。

说到精神方面,那时机关领导和同志们围绕我们的婚事,给予我们的关心和照顾,都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2月5日那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同一天结婚的还有刘通鸾和鲁竹青一对。这天,局机关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一把手局长李春监同志担任主婚人,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刘弗茄、张碧岑、刘建国、张薇之等都参加了婚礼,并都讲了话。机关的全体同志也都到了会,纷纷发言向我们贺喜。婚礼结束后,领导和同志们又排着一条长队,轮流走进我们那小巧温馨的新房参观。那种场面简直热闹极了。那天,机关还以我们婚礼的名义,结合过春节杀了两头猪,聚了一次餐。这在当时该是多么难得啊!

(张家芬)

### 棺葬改为火葬

1955年以前,武汉地区对待死者的处理方式大多还是棺葬,可我却目睹了一次将故去亲人由棺葬改为火葬的全过程。

1953年,我外祖父去世。他在世时,任汉口义勇消防队副总队长。汉口的这个群众性组织的救火队,又叫义勇消防队,从开始建立到结束的40个春秋中,由于队员热心公益,所以在每次扑灭火患之中,都不顾

个人安危,奋勇救火,得到群众赞赏。他在当时的汉口也算个小小的名人,这次患肺病而死,下辈们决定为其墓葬,以此表达行孝之情。

替长辈做丧事,又称为“白喜事”。一般在亡者落气时,都要请道士为其“开路”。在花楼街小董家巷23号(修建佳丽广场已拆除)的大门口烧了一顶纸轿子和九斤四两纸钱。末后,请来了一个老头,用新毛巾为他洗身,前抹三把,后擦四把。再用丝棉缠裹尸身,说是“可使骨节不脱”。穿上黑衣、黑裤和绣了花的黑鞋,戴上类似济公的黑帽子。即将他扶起,坐在一顶木制的轿子中。一班道士们则在门口的天井中吱吱呀呀地吹唱。据说,是念诵“倒头经”,这样可以使死者“遵礼成佛”。在入殓之前,有人把一大撮箕生石灰一下一下地铺入棺木内,再用皮纸(牛皮纸)在生石灰上铺成人字形,另外用皮纸装生石灰做成小包,以作填充尸体空挡之用,把绣有“西方接引”四个字的褥子垫好棺底,就准备装尸体入棺了。

出殡的前两天,就是正式开吊的日期,当时,来了许多至亲好友,送来了纸烛、挽联、祭幛和花圈。晚辈们对着端坐轿中的外祖父磕头,外祖母则是鞠躬。从吊筵来说,在堂屋正中开了二桌(小孩不上桌),有三蒸(肉、鱼、元子)等菜肴。出殡前一天,开始拆除孝堂,清理内部,把出殡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按以前习惯,邀集了族亲围在棺轿前,共吃一顿开水泡饭;孩子们吃的是糯米绿豆饭,又称为“吃衣饭”。

记得在准备入棺出殡时,我父亲从上海赶回,他对土葬颇不以为然。作为家族中惟一受过高等教育且又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他反对将其岳父土葬。于是,他历陈了理由,竟然说服了岳母等老一辈人。老

人们也觉得,既然已经风光了好几天,即使火化也算是对得起老人了,下辈人也不致背“忤逆”之名。意见基本统一之后,于是将外祖父作为老一辈中的第一人火化了,骨灰后来葬入扁担山公墓。

(叶文娟)

## 过 年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那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民群众也很穷,但对过年十分重视。俗话说,“叫化子也有三年年”。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民间习俗。在过年前一两个月,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做好计划安排。比如摊豆丝、熬苕糖、炒米泡、打豆腐、开油锅、杀年猪、打扬尘等等,是农民集中消费的季节。

各家办年事要看家庭人口和经济状况而定,有的办得丰盛,有的简单。一般人家要腌十多斤年肉,年鱼是门口塘喂养的家鱼,每户分三到五条不等,只有斤把重一条,没有上色鱼。打豆腐是黄豆,一般是十斤左右。开油锅主要是炸火菜、豆腐圆,炸鱼圆、肉圆的很少,炸麦角、翻饺的不多。

到腊月十五以后,妇女都要忙于洗衣被、打扫扬尘、搞环境卫生,干干净净迎新年。收成好一点的农户,都要给大人小孩做新衣服过年,一般都是土布的,新鞋子也是自家做的土布鞋,姑娘们也有的穿绣花鞋。有的也买新帽子、新袜子,帽子是瓜皮帽的多,顶上有个红砣砣。办年货的另一个方面是买香纸蜡烛鞭炮、门神、对联、灯笼和拜年的糕点食品等。门神有时是寺庙的尼姑、和尚化缘时送上门来,叫声“恭喜东家发财”,东家也要回敬一点东西给他们。

过年时,大门口要贴对联,挂红灯笼,

室内也要贴一些吉祥如意的红字条。如“出门大吉、对我生财”“只敬年节、勿忌童年”等,在牛栏、猪圈、鸡笼等处,贴“六畜兴旺”“水草长生”“鸡鸭成群”等吉祥语,体现新气象。在节前,还要对越冬作物的豆麦田、菜地进行一番管理,清沟、排渍、追肥、锄草,争取来年有个好收成。

年夜饭是辞旧岁迎新春一顿饭,是一年最丰盛的一餐,到时男女老少都上桌,一般都有八至十碗鱼、肉、鸡、鸭之类可口的菜。为了丰收的喜悦,吃年夜饭都要喝酒,那时只有散装的粮食酒,没有啤酒、甜酒和饮料,一大家人围坐一桌,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气氛十分活跃。当地还有个老规矩,施姓、李姓的宗族,每年都在腊月二十八吃年夜饭,这是历代祖传的风俗,也是有原因的。

在吃年夜饭以前,家家户户都要到祖堂屋和土地庙去上年饭,敬菩萨和祖宗,烧纸香、点蜡烛、放鞭炮、磕头作揖,以怀念祖人,当然也有封建迷信色彩。

那时过年文娱活动不多,没有电视、电影,有的村子大一点,玩龙灯、唱花鼓戏有之。一般的都是抹“上大人”纸牌和点子骨牌,没有打麻将和玩扑克牌的,赌博的也很少。三十夜要守岁,大家围着火炉烤火,各家各户都烧菟子火、叫年柴头,三十夜的火,月半夜的灯。边烤火边吃糖果点心,小孩子玩灯笼、放鞭,有的家长给小孩子发压岁钱,数量很少,一般是一千到两千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至两角钱。有的守岁到鸡叫才睡觉,各户都点油灯,直到天明。

拜年是过年的一个重头戏,按惯例是初一拜祖宗(先拜祖宗,后给村子各户拜年),初一路上无行人。初二拜家公,初三拜丈老,初四满山跑,到其他亲友家拜年。在初一给村子各户拜年,家家户户都要拜到,

即使是原来闹过矛盾、吵过嘴、打过架的,也要上门拜年,以消除矛盾,增进团结和友谊。拜年时,对长辈、平辈和年轻的媳妇都有不同的祝福,有的还要跪拜。上门拜年只限男性,妇女碰了头只说句祝福的话,不上各户的门拜年。初二外出拜年,风雨无阻,那时交通不便,有的要步行一二十里,甚至更远,小孩外出拜年,有的亲戚还会给压岁钱和糖果、米泡之类的东西。拜年一般到初七、初八就基本结束。有种说法是,拜年拜到初十边,一盅茶、一袋烟。妇女也兴出方(节后外出走亲戚),一般是在初八以后走娘家 and 姊妹家。出方男的一般不去,只接女客,不接男客,拿的礼品多是鸡蛋和面条。

年节活动一般在正月十五基本结束。正月十五吃月半饭,下午4时左右各家各户都做月半粩。多数是糯米粩和荞麦粩,小孩玩灯笼闹元宵,各户门口的红灯笼都是亮堂堂的,所谓新春大是年,年小月半大。吃了月半粩,各人种庄稼;吃了月半饭,各人去安办。年节过后要搞春耕生产,搞好田间管理,积肥送肥,修补塘堰。学生要上学,各行各业各就各位。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对农业、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季节,要为各自的生计劳碌奔波,到时是村村无闲户,户户无闲人。

(杨超群)

◇刘富道

## 黄心盒与汉口

我对黄心盒的研究,始于2000年初。我对汉口徽商的研究,始于黄心盒。最早从范锴的《汉口丛谈》知道黄心盒的名字,写入我的长篇传记《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时,当时电脑字库里,没有这个盒字,我用了描述的方式,写出了造字过程。山西作家韩石山看后,觉得有意思,写进了书评。这个过程就是:今字下面一个酉字,酉字下面一个皿字。盒字是庵字的同义异体字,我的书稿全部用庵字替代盒字。现在我要回到原点,写作黄心盒,电脑字库有这个字了。只有黄心盒三个字,才能体现这个人物那份厚重与潇洒;只有黄心盒三个字,才能表达我对这么一位历史人物的景仰与怀想。

范锴的《汉口丛谈》,是第一部书写武汉城市发育成长的史籍。同一时期,黄心盒写了一部《汉口漫志》,很遗憾,他没有见到

这部书稿刊印就仙逝了。武汉所有史籍上,都会出现黄心盒的名字,出现《汉口漫志》的书名,但这部书稿并没有刊印,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

黄心盒与范锴,在汉口这座移民城市里,应该是两位重要人物,是两位记录和见证武汉成长史的人物,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武汉现在的城市景观越来越美了,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武汉特色的人物雕塑。举办第二届中国汉正街论坛之前,汉正街在街头装点了好多雕塑,那时我就建议,为黄心盒和范锴造像。我也在另外的场合提到这个创意,可惜都没有被采纳。

写汉口徽商,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用文字为黄心盒和范锴塑像。我尤其要为黄心盒立传,我要让他的《汉口漫志》部分地重现。



## 黄心盒其人与《汉口漫志》的由来

还是用范锴《汉口丛谈》卷五的一段话介绍黄心盒吧。这段话我将分作若干部分，一小段一小段地道来。

黄心盒何许人也？

黄心盒名承增，歙人。伟岸修髯，交游甚广，工作诗词，文思斐然。尝往来燕北、汴梁、三湘、吴下，所至公卿倒屣，争相延至，为江湖上客。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盒也。

两游汉口，皆与题襟雅集，虽参末座，已有惨绿少年之异。

这是范锴对黄心盒的总体评价。黄心盒从事盐务，不像是老板，极有可能是雇员，也有可能是盐牙。盐牙即盐业中间商。他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在江湖上又很吃得开，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马虎他。有公卿争相请他，有翰墨之士交结他。

这里所说黄心盒前两次到汉口，范锴都跟他一起参与诗会，那时的心盒在诸多名士面前，虽然处于末座，但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早就引人注目了。

黄心盒与范锴相比如何？

丙寅，复自淮上来，侨寓痘姥祠，仆仆半生，鸟将飞倦，遂有终焉之意。值余重客汉上，因通缟纻。自后吟尊花社，酬倡日增，顿著黄范之目，每推敲过市，人咸指而视之，似以为两异人耳。然余寡学黜能，拘于孤傲，痴呆木讷，樗散早成，而心盒则具应世之才，高谈雄辩，四座俱倾，大有意气公然笼罩人之概，乃忝齐名，殊可愧也。

黄心盒第三次从淮上来到汉口，已经到了丙寅年，即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侨寓痘姥祠。痘姥祠供奉主管天花的菩萨，黄

心盒在僧寓里，应该是暂住。这时年已半百吧，想定居下来。范锴也回到汉口，两人形影不离，被人并称黄范。范锴以为心盒是应世之才，心盒在众人之中，显示出笼罩所有人的气势，自己在心盒面前要矮一大截子，怎么能够与之齐名呢？

黄心盒为何写《汉口漫志》？

心盒偶语及汉口曩日前辈风流，渺不可再，辄抚腕嗟叹。余曰：“四美二难，不可兼得，人固知之。而中寓盛衰之感，人莫知也。数十年来，君阅历已深，矧擅文笔，曷不纪之？”心盒颌笑四三，遂有《汉口漫志》之作，中载生平交游，倡和居多，得二十三卷，未竣而卒，悲夫！

黄心盒跟范锴发出感叹，说时下已不及前辈风流了。范锴说的四美二难，四美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即贤主、嘉宾。范锴对心盒说，你有这么深的阅历，又有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写出来呢？于是，心盒写出了《汉口漫志》，可惜还没写完就谢世了。

黄心盒后人呢？

先以无子，在汉续娶徐氏，生女二，子一，名锡畴，才七岁。

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心盒落籍汉口，终老汉口。

以上引文，原文为一整段。

心盒去世时间，范锴记载为：“辛巳，心盒歿于四月。”即清道光元年，1821年。

黄心盒享年多少？我的推算是，他于1806年第三次来汉口，既然有“仆仆半生”之叹，年龄或在45岁至50岁之间。1821年去世，即在汉定居15年，享年当在60岁至65岁之间。这个年龄，其时不算高寿，也不能算低寿。他的《汉口漫志》还没写完，他可能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人生的尽头。他续

娶徐氏,生三个孩子,子锡畴才7岁。往昔重男轻女,儿子排列在后,不会是老大,肯定是个老二或老么。从续娶时间、生育能力、子女年龄等各方面分析,以上推算的年龄,大体错不到哪里去。

我还以为心盒比范锴年长,其实也大不了多少岁。范锴对心盒,在年龄上、在学问上,有着双重的尊重。

这一节的结语,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范锴的点化,就不会有黄心盒的《汉口漫志》。

### 没有黄心盒,很难说有《汉口丛谈》

黄心盒《汉口漫志》写了二十三卷,范锴说是没有写完,其实再写下去,写多写少,都无所谓。《汉口丛谈》只有六卷。《汉口漫志》有二十三卷,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字。我想至少应该够一本书的分量吧。

值得庆幸的是,《汉口漫志》虽然未曾付梓,但这个书名流传下来了,这本书的许许多多史料流传下来了。其中最为精粹的史料是:

世宗自安陆入继大统。御辇曾过汉口。今有接驾嘴码头,俗讹呼薛家嘴;又有报驾墩,讹呼鲍家;送驾墩,讹呼宋家。

以上这段史料,引自《汉口丛谈》。这段史料也被《续汉口丛谈》转引了。后来及至当代史籍都引这段话,而且都注明出处在黄心盒的《汉口漫志》。至于黄心盒这段资料从何而来,那就知道了。

一本并没有刊行过的书籍,又被承认是一本存在过的书籍,它的知识产权至今仍归属于黄心盒,范锴功不可没,是他最早通过《汉口丛谈》,确认有《汉口漫志》这部书稿。1806年至1821年间,当时的汉口徽

商,当时的汉口文人圈子,恐怕有不少人知道黄心盒在写这本书,但这段历史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黄心盒于1821年上半年去世,第二年,道光二年,即1822年,范锴的《汉口丛谈》刊行。范锴著述甚丰,有二十二种存世,唯有《汉口丛谈》,名声籍甚,著目列入《清史稿·艺文二》地理类杂志之属。

这部书刊行之后,在汉口的影响大得不得了。清末曾任法制局参事,民国时期曾任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的汉阳县人周贞亮,在《汉口丛谈·跋》中写道:“三十年来,访求不获。近闻厂肆间有其书,辄为外人重值收去,吾乡人转不易得,得者亦不轻出示人。”在《晚喜庐随笔》中,他写出了对这部史籍的一片痴情。幼时,他从同里人那里见过这部书,入朝以后,“求之十年不得”。1921年,“有乡人得之,求假一观,诺而不与。”你看看,只是借来一观,人家答应了,但就是不借出手。后来,从同邑李星樵太史处借得,“令写人传钞一部”。

曾任北京图书馆总纂的方志学家罗田人王葆心,在任武汉大学教授期间,从徐焕斗处得到《汉口丛谈》一钞本,命其子王夔武“写一副本藏之”。

20世纪20年代,得益于几位学问家的细心呵护,由王夔武遵从父命,《汉口丛谈》在首次刊印111年之后,于1933年得以校勘重印,这部史籍遂得以流传。

《汉口丛谈》这部书直接引发出研究汉口历史的一些新成果。孝感人徐焕斗,民国初年的汉口警察局长,编纂了一部《汉口小志》。王葆心撰写了《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王氏的这两部著作,把所记范围延伸到湖北各地。

相比洛阳纸贵的《汉口丛谈》,《汉口漫志》是一个被冷落的结局。

《汉口漫志》的手稿到哪里去了呢?

我的答案是:在范锴手里。

《汉口丛谈》,人称野史,非正史也。说它是野史,并没有贬低它的价值,也无法贬低它的价值。因为,它是第一部写武汉城市发育成长的史籍。说它是野史,是因为它不同于有《史记》以来一般正史的写法。它是一部笔记体的著作,彰显作者浓重的个人特色,而不在意客观地全面地记录史事。有学者称《汉口丛谈》是一部词话集,这是十分精准的观点,不仅因为诗词曲赋之类的韵文,占住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而且全书

结构就是以记录历朝历代诗人词客作品为主体。

范锴字白舫,有极好的诗词修养。湖北天门籍人士熊士鹏为《汉口丛谈》写序称:“白舫有隽才,而家贫,工诗,尤善词。合姜史苏辛为一手,浙东西无出其右。游汉上与常芝仙交最久,芝仙善画,白舫善词,得两人一画一词,世称双绝。皆隐君子也。”常芝仙先籍芜湖,迁徙汉上,已阅三世。范锴以为,常芝仙的学问品性,皆兼当为师友。范锴作为一个词人,并未在中国词坛留名,竟被熊士鹏推崇到与宋代词人大家姜夔、史达祖、苏轼、辛弃疾比肩的位置上,可见其在汉上的影响之大。



黄山市屯溪藏家收藏的刻有黄心盒字样的印章



印章边款上刻有黄心盒字样

正好,黄心盒也工于诗词,而且是一位让范锴仰视的诗坛高手。范锴是个有心人,每次寓居汉口,每与心盒吟咏,都记录下来。与其他词客吟咏,也都记录下来。他记载最多的是心盒。

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手头的《汉口丛谈校释》,每自然段都附有注释,注释字体为小号字,统计正文字数比较麻烦。为此,我专门网购一本1933年版《汉口丛谈》影印本,全书正文字数约为107千字。我再将《汉口丛谈》写到黄心盒的正文部分,全部输入电脑,计有32处,电脑统计字数16千字。全书提及《汉口漫志》或简称《漫志》共9处,其中前五卷7处。涉及黄心盒文字,约占全书14.86%。这个比例够大吧。

我在将黄心盒相关文字输入电脑时,将前导入文字,后延伸文字,尽量压缩。因此,如果加上由黄心盒而来的衍生文字,则篇幅所占全书的比例会更高。

更有甚者,1933年版卷六,全文10752字,黄心盒文字计9679字,占90%。

卷六所有黄心盒文字,全部从《汉口漫志》二十一卷原文摘抄过来。

如果没有黄心盒的《汉口漫志》,《汉口丛谈》就不是六卷本,而是五卷本。

反复阅读《汉口丛谈》,我有一重大发现,全书写到有名有姓人物,约有一百位多一点,而其中歙县人就有28位之多,占四分之一以上。再加所写其他徽州人士6位,这些还不包括姚鼐、方苞等其他6位安徽籍人士。我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这本书,专辟《范锴与黄心盒》一章,其中一节是《范锴为何偏爱歙人》,我找到了缘由。心盒旅居汉口期间,每每成为聚会受邀主角,而范锴都可牵着心盒衣角,进入这些社交

场合。正是心盒,把范锴引荐到徽商中间,拓展了范锴的社交圈子。范锴毫不讳言自己家贫,在盐商中间,他也许只是一位普通雇员,他把心思过多用来寻章问句,不可能在商业上有太大的造诣。因为他的家贫在朋友中间早已不是秘密,所以他就经常得到徽商们的关照。嘉庆丙寅(1806年),范锴由淮扬到汉口,次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歙人方岩夫忽闻窗外雪声大作,惊呼:“范叔得无寒乎?”马上派人给范锴送去一件羊皮袄子。由此可见他与徽州人相处的亲密程度。

一部《汉口丛谈》,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人为主体的诗词唱和集。范锴虽然也写了一些其他地域的商人,以及本地的商人,但所用笔墨少之又少。他用了较多篇幅写陕西籍商人王栎门,而王栎门也是徽州商人的至友,他经常泡在徽州商人中间,展示自己的诗词才华。栎门家境也差,也十分好客,即使典当衣物,也要让朋友一醉方休。正是一帮徽州人捧着范锴,护着范锴,他才有可能占有如此多的素材,写成《汉口丛谈》。

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说,没有黄心盒,不一定有《汉口丛谈》。

两部最早写武汉的史籍,《汉口丛谈》与《汉口漫志》,就动笔时间而言,孰先孰后?

这个问题重要吗?

不重要。

但有意思。

诚然,是在黄心盒发出“仆仆半生,鸟将倦飞”的慨叹之后,是在黄心盒发出“前辈风流,渺不可再”的嗟叹之后,范锴向心盒进一言,让他把自己的阅历写出来,于是才有了《汉口漫志》二十三卷的未完成稿。

黄心盒在汉口定居下来,续娶徐氏,生儿育女,算是过日子了。经商的事情,或干或不干,或多干或少干,不再四处颠簸了。

潇洒的人生,虽然不会立马打上句号,但生活的节奏也许会放慢一些。他要潜心做一件事情,要留一本书给后人后世,留一本书给汉口。

范锴隔三差五要见心盒,以心盒大大咧咧的性格,以黄范日久弥深的交情,心盒的手稿不会不让范锴先睹为快,而且还可以带回家去看。

心盒《漫志》,昔假读之,大半历叙生平游踪所至之事。若有关于汉口者,寥寥数则,盖书作于汉口而名耳。

这一段对《汉口漫志》的评价,范锴写进了《汉口丛谈》。

1933年版《汉口丛谈》,还有一段未收入校释本的评价:

黄心盒自号楮山词客,所著《汉口漫志》中,有涉于汉口琐事者,十无二三。故题曰《漫志》,亦散漫之意也。其二十一卷,荟载汉上红楼妙伎独多,因附记之。

显然,范锴对《汉口漫志》的写法,不说颇有微词,也有不满足的地方。或许正是这样,他看到这一选题大有拓展的前景。于是,于是,他就动笔了?

范锴给予《汉口漫志》最积极的评价是:

黄心盒三游汉口,皆有题襟之会。尝语及昔年汉上盐醴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窈,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阴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前辈风流,犹可想见。数十载来,已成《广陵散》绝。盈亏之怅,其何能已?爰作《汉口漫志》,未竣而卒。

心盒笔法,范锴心领神会,在《汉口丛谈》中一一表现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口丛谈》卷六。所谓“心盒《漫志》,昔假读之”,不仅仅是早先借来读过了,而且是:

其二十一卷,荟载汉上红楼妙伎独多,余曾草录一册。今心盒已没,杂著稿本,散失殆尽。惟此诗词存数十首,因附记三十八则于后,亦北里烟花《板桥杂志》所不废也。

你看看,他还将二十一卷,“草录一册”!

“草录一册”,什么意思,作何用途?

这“草录一册”,整个儿搬进了《汉口丛谈》,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汉口丛谈》。

《汉口丛谈》卷六,九成文字,就是心盒的原文照录,原原本本地抄录。

古往今来,有这种搞法吗?

所有抄录文字,不只是黄心盒诗词,还有他所写与友人唱和的细节。如果说范锴欣赏黄心盒诗词,抄录一些犹可,你把人家书稿全文照抄,如果不是别有所图,就不可理喻了。读者须知,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影印设备,全靠毛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这要费多少闲功夫呀。

我在感激范锴留下了黄心盒小部分心血之作的同时,我不能不说出我压抑心中的郁闷。

《汉口漫志》已经写了二十三卷,按中国人对数字的使用习惯,我以为剩下的只有一卷,因为二十四卷,就是一个习惯上的圆满之数。

如如我之见,写到二十四卷,即可成书付梓,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又有什么必要亲自草录一册呢?

再看看《汉口丛谈》卷五的一段文字:

《漫志》:岁在甲辰,王蓬心宸司马、宜

昌徐袖东观海司马、武昌顾牧原駟司马、汉阳家伯氏默谷燁照前任广州司马，皆以书画诗文，迭主坛墀，文采风流，照耀江汉。又得徐敏庵刺史、荀龙、毕花薑明府怀图，储玉琴、鲁星村两明经为寓公，倡予和汝振雅提风。同时，骚客词人，书家画手，莫不争相砺淬羽翼附庸。下至名优妙妓，胥各售其所长，更莫悉数。上以佐鼓吹休明之盛，下以乐礼教富庶之风。汉上人文，自当蔚然兴起矣。

这是黄心盒写甲辰吟社的文本，范锴完整地搬进自己书稿里了。这年范锴还在四川奔波，并不在甲辰吟社活动现场，次年他来到汉口，即使听黄心盒说起过，仅凭记忆不可写得如此完整。那么，这一段文字，范锴是在黄心盒生前“草录”下来呢，还是在黄心盒死后抄录下来呢？

还有一大疑问，为什么没有人给黄心盒刊行这部遗著？

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吗！

范锴是没有能力为之。

其他朋友呢？

都到哪去了？

心盒去世才一年时间，范锴出书就写上：“今心盒已没，杂著稿本，散失殆尽”，而且是“惟此诗词存数十首”，就是写青楼的部分。这是什么道理？

范锴所录心盒三十八首青楼诗作，究竟是“昔假读之”“草录一册”呢，还是心盒西去之后抄录的呢？谜。

### 新安书院，心盒无名

有些历史的巧合成为历史的美谈，有些历史的巧合成为历史的笑谈。我此刻笔下的一个历史的巧合，只能让人唏嘘不已。

清嘉庆丙寅(1806年)，是黄心盒第三次到汉口，从此在汉口定居的第一年。

同样是嘉庆丙寅(1806年)，是《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成书的一年。从头到尾读完这本史志，我没有找到黄心盒的名字，也没有找到黄心盒的本名黄承增三个字。

一位望重儒林的徽州歙县籍人士，为何没能登汉口紫阳书院的大雅之堂，留下一点墨迹呢？

他来迟了吗？

董桂敷为这部书写序的时间是丙寅夏五月，写跋的时间为丙寅仲冬，而黄心盒“丙寅中夏”肯定已在汉口，这期间没有见到黄心盒吗？

黄心盒三游汉口，此前两次来汉口，没有请他留下墨宝吗？

汉口紫阳书院有那么多亭堂楼阁，每处都有序有记，为什么轮不到黄心盒呢？

就在《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截稿的嘉庆丙寅年，董桂敷还为书院题写了“源深泽远”匾额。他所署题款是：嘉庆丙寅仲夏月赐进士 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婺源后学 董桂敷 敬书。

看来，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黄心盒没有相当的头衔。董桂敷，进士，京官，有头有脸。

古今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拼命往权力的上位攀爬，要拼命往职称的上位攀爬。

汉口紫阳书院里，在那么多匾额上题字的官员，没有几位留下名来。黄心盒《汉口漫志》虽然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留下了，他的著述部分地留下了。

老天无眼，汉口紫阳书院，已经全部毁了，连同那些匾额，连同那些题记，连同那些墨宝。

老天有眼,让那些权重一时的官员,让那些名重一时的文人,统统消逝了。

黄心盒三游汉口,什么好地方没去过,《汉口丛谈》一一记载下来了。唯独一个好地方,没有留下他的足迹,或者说没有记载他的足迹,那就是汉口紫阳书院。

汉口紫阳书院,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可住宿可歇脚,为何不见黄心盒光顾?不仅心盒未见光顾,而且那一班文朋诗友,都没有在那留下墨迹,个中肯定有什么过节。

《汉口丛谈·凡例》第二条,专指卷二内容,写道:“汉口重镇,坊市街衢,花宫梵宇,指不胜数,今就大略记之。若招提会馆,或有文人题咏,尚寄同志者录云,再为编续,幸甚。”

事实上,卷二罗列了汉口大大小小的“花宫梵宇”,大者如山陕会馆的西关帝庙、大观音阁、药王庙,小者如大智坊的白贛洲茶肆,马王庙左右的骡马店,有几个点如西来庵、药王庙东厢别墅、天都庵,都用大篇幅留下诗文。而紫阳书院呢,只在街衢列表中,列出新安书院的位置。

倒是另一处,再提新安书院,原文为:“送驾墩,在新安会馆后,为歪妓所聚之处。”这大概不是紫阳书院的什么光彩。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不讹,我专门将全书一页一页地搜索两遍,找不到多少叙述紫阳书院的文字,仅仅有一处提到准提庵,算是紫阳书院“别建”的范畴。

汉口紫阳书院,在汉口算是规模最为宏伟的建筑群,只有山陕会馆可与之比肩,范锴却一笔不提。这让我想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紫阳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几经扩建和修整,到清嘉庆年间重修书院志,整个过程都有官方背景,都是官商结合的运动。用当今的语言,就是在体制内运行。而

黄范人等,没有官方背景,好比在体制外活动。这些文人墨客,大都自恃清高,也不喜欢繁文缛节,不屑于同官场打交道,不屑于同接近官场的商人打交道。尽管这些人成就斐然,但是高官面前,在大贾眼里,不过就一帮穷酸文人而已。因此,对于像紫阳书院这样的大雅之堂,并不稀罕黄范们,黄范们也不稀罕这个场子。

偶尔,也有官员附庸风雅,请黄范一帮骚客搓一顿,这种时候黄范们顿觉身价高涨,以为这个地球有了自己会转得快一些。其实,酒桌上的好听话说过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阶层里,做官的依旧摆出做官的姿态,穷酸文人依旧穷酸加上自慰似的清高,两者互不搭界。

我去了黄氏聚居地之一的潭渡,62岁的黄亚光从水田里回来,他看了我们带着的新版《歙县志》黄承增条目,十分肯定地说,没听说这个人。“监生,捐的。”他说,“我们这里讲文会,科举考试,凭本事,捐官不行,被看不起。举人,牌坊不刻,起码进士。”看来,黄心盒是不是潭渡人,无法确定。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歙县当地,名气没有流传,也许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官场没有任何头衔,在科举考试中也没得到名分。

◇ 杨 华

## 杯酒释礼(上)

古语有云,“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与此相同,民间有另一种说法:“无酒不成席。”亲朋相聚,逢年过节,社交应酬,免不了吃饭喝酒。然而,“非礼勿动”,喝酒也要讲礼,下面就谈谈其中的礼数。

### “先干为敬”

喝酒免不了要“干杯”。怎样才算干杯?今天的办法是,把自己和对方的酒杯都斟满,然后拿自己酒杯去与对方的酒杯碰一碰(如对方是尊者长者,据说最好让自己的杯口低于对方的杯沿),然后“先干为敬”,用期待的眼神邀约对方也随之喝尽。

这种喝法与中国传统的喝酒礼仪是否一脉相承?还是先从“干杯”说起。所谓干杯的干,是空和尽的意思,而不是干活的干。干杯就是要把杯中之酒喝空喝尽,而不是使蛮力,拿着酒杯干一通。前者念作平声

(一声),后者念作去声(四声);繁体字干杯写作“乾盃”,而不能写作“幹盃”或者“干盃”。同理,现在常说的“先干为敬”,意思是先喝尽这一杯酒算是表达敬意,而不是先干活表示尊敬。不过,乾、幹、干等字常常通假互作,繁简体字转换更是搞得一团浆糊,那又当别论。如果用英文表达,我最喜欢的翻译是 Bottom Up,直译过来就是“杯底朝天”,喝完痛快;如果翻译成 Cheers,反倒不够尽兴,那只是碰碰杯,大多意思意思而已。总之,今天大家常说的“干掉这杯酒”,多少有些语病。

这种一杯喝尽的办法,古代叫作“酌”。许慎《说文解字》:“酌,饮酒尽也。”按照清人段玉裁的注解,这是一个形声包会意的字,“饮酒尽”应当作“饮爵尽”(爵是夏商就有的古老酒器,下文再说)。近人杨树达先生指出,这就是今天的“干杯”。《礼记·曲礼》:“长者举未酌,少者不敢饮。”经学家郑



玄解释说,酹就是“尽爵”,长者还没喝光,年轻人不要先喝酒。郑玄(公元127~200年)和许慎(约公元58~147年)都是东汉的大学问家,二人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可是在解释喝酒的动作时,却毫无分歧。

中国自有文明以来,就离不开喝酒。据说商人沉湎于酒,虽然那时酒度数很低,类似于今天的“醪糟”,但商人竟然因此而亡国。《尚书》中专门有《酒诰》一篇,便是周人灭商后的戒酒训辞,算是中国第一篇禁酒令。现在发掘出土的上古饮酒器相当丰富,觚、爵、角、斝、觶、觥之类,大都是青铜铸造,个头也不小,动辄二三十多厘米高。如果按照现代礼仪,拿这么大这么沉的青铜家伙去碰杯,还真要点力气才行。而且,上古实行分餐制,各人跪坐在自己的席子上,要去跟其他席位上的人碰杯,还要上席下席,颇费一番周折。

上古之所以不碰杯,并非怕周折。根据上古的礼仪手册《仪礼》,那时贵族之间敬酒自有一套仪式,其繁复程序远远超过今人想象。主人向宾客敬酒,首先斟满一爵,走到对方席前请他喝下,称为“献”;然后,宾客又斟满一爵,回敬主人,称为“酢”;主人饮过之后,又自饮一觶,再斟满一觶,以献给宾客,但宾客并不真喝,而是放在一个土台(“坫”)上,称为“酬”。这样的献、酢、酬一套程序做下来,叫作“一献之礼”。贵族等级越高,献的次数越多,有三献、五献,甚至七献、九献。如果九献做完,那便是三九二十七遍!想想就觉得复杂。更麻烦的是,这些过程中用的可能就是同一个青铜酒器,每次献酒和回敬,都要下堂去“洗爵”。古人居住的正堂要高于中庭几个台阶,在庭中专门设有一个洗礼器的地方。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即便换了一个酒器,在敬酒之

前也都要亲自去洗净。当然,对方总要推辞一番,叫作“辞洗”。

把酒一口喝下去,叫“卒爵”。然而,这卒爵也不简单。为了表示对前来敬酒者的尊重,你不仅要答拜,而且还要到你该站的位置上(比如西阶上)才能卒爵。喝酒之前,要到席的末端用嘴浅尝一下酒,叫“啐酒”。尝酒的目的,是为了“告旨”,即称赞主人美酒之香甜。反过来,主人也要客气一番。目送客人卒爵之后,主人还要予以答拜,表示自己不好意思以恶酒填满了宾客的肚子,这叫作“崇酒”。喝酒的过程中,还有多次跪拜,酌满酒送给对方请其饮酒,主人必须“拜送”。对方卒爵,主人必须“拜既”。当然,这些都是高规格的饮酒礼仪,按照身份高低、礼仪轻重,有些环节可以省略,可以变化。比如,礼节隆重的要跪着喝,礼节简易的就直接站着喝了。

秦汉以后,各代流行的酒器名称不同,有卮、杯、盃、樽、盏等,一般还是各喝各的酒,似乎也没有碰杯这一说。古人常说“奉酒为寿”“举酒称寿”,是指端着酒器走到对方跟前,向其敬酒,说些祝颂之语。鸿门宴上,范增让项庄去杀刘邦,就是先向刘邦“为寿”,唐代颜师古的注释是:“凡言为寿,谓进爵于尊者,而献无疆之寿。”向长者、尊者敬酒,祝其长寿自然是应有之义。《朱子家礼》中记载了官宦人家平常“上寿于家长”的仪节。先由子弟们盛装拜见家长,然后长子站到家长面前,他的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位年幼者,分别拿着酒壶和酒盏,由长子跪着斟酒献给家长,献酒时还有祝辞:“伏愿某官,备膺五福,保族宜家。”家长饮过之后,把酒盏还给少年,大家各自回到己位。家长让大家坐下,命仆人给全家人都斟上酒,大家喝完后出门,换上便服,各行其事。

到宋元时期，上古那一套敬酒礼仪仍然得以保存。元代《事林广记》载有宾主献酢之礼，十分详细。它将宴饮分作三个情况：一是宾客是比主人身份高的长者贵者，二是宾客与主人身份相匹，三是宾客是比主人年轻的少者。这三种情况，宾主之间的答拜自然会有繁简之别。大致与上古的《仪礼》相去不远。虽然此时酒器已由爵、觶之类演变为杯，而且人各一杯，不再是同一个酒器的传递，然而，主人向贵客敬酒时，仍然要亲自盥洗酒杯，也必须亲自斟酒、献酒，以示尊重。客人当然也保留着“辞洗”的环节，并且也会回酢主人。亲洗酒器，到中古时代除了表示尊重，还有防毒这一层意思，看过《水浒传》《天龙八部》等小说，便知酒中下毒的厉害。据说杨家将中长子杨延平就是在辽国天庆王的鸿门宴上，误饮毒酒而亡。

上古礼仪，繁琐至极，唐代已经吃不消，宋代人做了大量简化工作，迨至明清，



更是朝简便易行的方向发展。饮酒仪式也是如此。清代乾隆年间编辑的民间日用礼书《酬世锦囊》中，设有“晋接常仪”一节，其中的“奉酒”环节大致如下：

奉酒。（凡斟酒只可大半杯，若满杯恐有泼洒，岂不失仪？——括号内文字为原注，下同。）主人命介斟酒，双手恭身自捧至席上。（如席多者，命倍主代奉。）客恭身领杯在手，向本席客必先逊让过，然后安放席上。主人候众客酒各齐备，方举杯云“请饮”。（或云“请酒”。）客云“请”。主人将酒已奉众客，则众客将酒奉主人。（或系尊客，便云“不敢回敬”。）凡初斟酒一杯，主人先举杯，向客端拱云“请”，客亦举杯向主端拱云“请”，然后同饮。每酒一杯，主人必先饮干，然后以空杯劝客。（主如量小者，只斟半杯酒。）

此种文字是清代的乡间普及读物，故而通俗易懂，不需多做解释。总的看来，400年前的酒局套路，与今天相差不多。例如，一场

酒局的开始，是主人先举杯，向大家拱手说“请”字，然后宾客也拱手说“请”，大家同饮。又如，“凡斟酒只可大半杯”，就是老辈常说的“茶七酒八”。至于“回敬”一节，清代的尊贵客人自称“不敢回敬”，实即尊者、长者不必回敬幼辈卑者，今天饭局上大致也是如此，不过有时也可看到老人回敬小辈、上级回敬下级的场景，想必是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

中国古代饮酒图

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以空杯劝客”,先喝干一杯酒再请客人喝,也就是今天酒桌上“先干为敬”的意思。上文所言,《乡饮酒礼》的“一献之礼”的第三道,是“酬”这个环节:“主人实觶酬宾。”汉代郑玄的注释说,酬就是“劝酒”。唐代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酬酒先饮,乃酬宾”,意思很明确,劝人喝酒,自己必先喝。《诗经·小雅·瓠叶》是一篇关于饮酒的诗,其中唱的是贵族们烧烤兔肉下酒的场景,歌中喝道,“君子有酒,酌言献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正好是献、酢、醕(酬)的一献之礼。按照西汉人毛亨的解释,醕(酬)就是“道饮”。什么意思呢?郑玄的说法是,主人接过客人还敬的“酢爵”,喝过(“卒爵”)之后;又自己喝了一爵(“又酌自饮”),然后再斟满一爵,奉给客人,“犹今俗人劝酒者,俗人亦先自饮而后劝人,故云醕之”。可见,东汉时平民饮酒是先自饮一杯,然后再敬奉客人一杯。隋唐时期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当时对西汉毛亨解释中的“道饮”二字出现了两种读音:一是发作“徒报反”(所谓“反”,是一种古代拼音法,即取上字“徒”的声母与下字“报”的韵母相拼读),即按道理、按礼节而饮酒;另一种读音是,“亦作‘导’”,也说是说,自己先喝,再引导、劝导别人喝。唐人孔颖达也是从平民饮酒的角度来解释的:“俗人亦先自饮而后劝人。”可见,唐代中国的平民喝酒,也是先自饮,然后再敬奉客人,与今天所谓“先干为敬”其实差不多。

按照这个喝法,主人必然要比客人吃得更多、喝得多。到了宋代,朱熹的弟子们似乎不太明白这种喝法的道理,问师傅什么叫“导饮”。朱熹先讲了一遍献、酢、酬的道理,说主人跟宾客进行一来一去的献、酢回

合之后,又自饮一杯,其目的是“导宾使饮”。朱熹接着说,宋代流行的谚语“主人倍食于宾”,就是指这种情况。清代礼学家凌廷堪把这种喝法做了更简捷的总结,“凡主人先饮以劝宾之酒,谓之酬。”到了晚近时期,则凡要请对方喝酒,必然自己先喝。“酬”扩展为一种广义的待宾之道。今天酒局上,也有“主不引,客不请”的说法,大概类似于此。

如此说来,“先干为敬”,原来一直是汉唐以来礼学家眼中的“俗人”饮酒之法。不过,它与上古饮酒之礼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截取了“一献之礼”中的一部分而已,经过历代简化传承,现在演变成了所有举杯的开始。

### “劝君更尽一杯酒”

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因为躲避国内的君位之争,在齐、卫、曹、楚、秦各国流浪。虽然重耳早就贤名远扬,但是他未来能否重返晋国继承大位则前途未卜,于是各国对他的态度也有冷有热。公元前637年,当重耳经过曹国时,缺乏远见的曹共公就对他很不客气,竟然想趁重耳洗澡时偷看他的“骀胁”,据说这种肋骨连成一个板块的生理缺陷,是天赋异禀的圣贤迹象。不过,曹国大夫厘负羁却是个明白人,在多次劝谏曹共公无效的情况下,他跟重耳建立了私交。他的办法是,私下招待重耳一行人吃饭,并在重耳的饭食下面悄悄埋了一块玉璧。重耳后来成功地回国继位,这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后来虜灭曹国,而厘负羁一族则得以独活。

在饭食中埋璧的寓意,重耳当然明白,那是古礼中“侑食”“酬币”之礼。《仪礼》中

有《公食大夫礼》一篇,专讲国君在宗庙里如何招待来使的大夫。经过正饌、加饌等环节后,国君想让对方再多吃点,便要用馈赠礼物的方式来劝慰他,这种用礼物劝食的环节叫作“侑食”。侑食所用的礼物是“币”,指玉、马、皮、圭、璧、帛等,它们合起来或者分开来都可称为币。现在简写为“币”,使其本义失掉大半(当然丝帛在当时也可作为货币流通)。这些币,有些固定的组合,比如常见的是“束帛”(即从两头向中间卷起的一幅丝帛)跟玉器搭配,称为“束锦加璧”“束帛加璧”,或者再加些皮具、乘马之类。

上古招待宾客,从高到低分为飨礼、食礼、燕礼三个档次。一般来说,燕礼主要喝酒,食礼主要吃饭,飨礼则既吃饭又喝酒。劝人吃饭,要用礼物,叫作侑食;劝人喝酒也要用礼物,叫作酬酒。只不过,燕礼的规格较低(在寝宫举行),不用礼物也能劝酒;而食礼和飨礼规格较高(在宗庙举行),要用礼物才能劝酒。《聘礼》《公食大夫礼》规定,国君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生病之类)而不能出席招待仪式,便让臣下拿着丝帛玉器去向宾客劝食、劝酒。正因为熟悉这些礼数,所以落难的重耳才深知厘负羈在他饭中埋一块玉璧的情谊。

上古吃饭喝酒大有讲究。吃饭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外交场合、朝堂君臣相会等大场面的吃饭,称为“礼食”;一种是日常吃饭,即使是招待宾客,也不必讲究过甚,称为“燕食”。燕食过程中的喝酒,自然称为“燕饮”。燕饮既然不用礼物来劝酒,那么怎样才能促使客人多喝呢?跟今天一样,做游戏就是一种好办法。有一种游戏,延续了几千年,那就是投壶。宾主轮流把箭矢掷向壶中,以投中多者为胜,投中少者为负,负的一方被罚喝酒。在《礼记》中专有《投壶》一

篇,详细记载了投壶游戏的细节。宾主喝到一定程度,主人拿出投壶工具说:“我有弯箭、歪壶,请用它来助助兴吧。”客人说:“您有美酒佳肴,我吃了喝了,还有娱乐,实在不敢当。”主人再劝,经过两番推辞,客人终于接受邀请,参加这种游戏。投壶过程中,有专门裁判(名为司射)为之计数,计数用的是类似于筷子的竹制算筹(青铜和金银的算筹已见于今天的考古发掘)。投壶的规矩是“胜饮不胜者”,即胜利的一方酌酒罚不胜的一方。当负方被罚酒时,胜者一方让人(通常是己方的弟子)为负方酌酒,说:“请行觴(请喝吧)!”被罚酒的人跪地接过酒杯,回答说:“赐灌(谢谢您赏我酒喝)。”而胜的一方则说:“敬养(请您保养贵体)。”这一辞一答,一劝一饮,有如戏剧表演,言辞和动作之间处处透着雅致。

虽然后来的劝酒不再依赖投壶游戏,但历代儒家都把投壶作为儒生的基本修养,宋明理学家无不精于此道。到了近代,投壶礼衰落,能够通晓其仪的也凤毛麟角了。1926年8月6日,大军阀孙传芳居然在南京举行投壶之礼。原定由现代大儒章太炎亲自主持其仪,但章氏当天有事并未亲临。两天后,《申报》在“国内要闻”中刊登了一篇《宁当局举行投壶新仪记》,就报道了这一“盛事”。投壶之礼在宋明时期传到朝鲜半岛,被“朝鲜朱子”李退溪(即李滉,1501~1570年)大力推广,以至于今天韩国面值1000元的纸币上,还画着李退溪的半身像和投壶道具的图案。

劝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搞不好要闹出人命。汉代豪侠郭解为人仗义,朝野闻名,其外甥与人喝酒时,仗着其舅舅的势力,强迫对方一口喝干(“使之釂”),对方不胜酒力,他竟然“强灌之”。对方被逼急了,



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

把他给杀了。唐代名相裴度(公元765~839年)还没做大官之前,有次跟一群武痞喝酒,被武痞们灌得下不了台。这时他的朋友胡证闯来救驾,胡证是个膂力绝人的大力士,他先仰头喝下三杯,然后一把拉过支撑灯烛的铁架子,用手折去铁灯架的枝枝杈杈,又用力把铁灯架的三个脚压平,捋直成一根“铁棍”。随后他把这个“铁棍”横在坐膝上,对在座的酒客说:“我来定个酒令,如果杯中酒喝不干净,就用这根铁棍打他。”说完,胡证又连喝几杯,把酒杯传给下一位,酒客中果然有喝不干净的,胡证举起“铁棍”就打,这帮武痞恶少吓得叩头如捣蒜一般。以上两件事,可都是入了正史记传的。

对于有些人而言,劝酒纯属多余,有酒便喝,何须人劝?刘邦本是无赖出身,跟随他提着脑袋打天下的大多出身低贱,能吃能喝,根本不懂得也不需要礼仪。鸿门宴上,屠狗出身的樊哙闯入军帐,切下猪蹄就啃,端起卮酒就喝,项羽都为其豪气所动,

问道:“还能喝吗?”樊哙答道:“咱连死都不怕,喝酒算什么!”靠他的好酒量与项羽周旋,刘邦才得以逃命。刘邦集团统一天下后,像樊哙这样的军功贵族自然毫无规矩,难于管束。史书记载,他们在朝堂上饮酒争功,居然“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伤透脑筋,而专精于礼仪的故秦博士叔孙通猜透了皇帝的心思,他专门设计了一套朝会礼仪,让儒生弟子在野外用草人演练了个把月,刘邦一看并不复杂,就让文武百官照此办理。

检验的时刻到了。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新年朝会,天还未亮,就有专人把各路将官引到各自该站的位置,司仪喊:“趋!”于是功臣、列侯和各路将军、军吏按照顺序站在西边,面朝东向;丞相以下的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向。然后,皇帝坐着辇舆出来,百官举着旗帜传呼清道,引导着诸侯王以下、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依次上前向皇帝拜贺。见到这阵势,在场的文武官员无不充满震惊、恐惧和肃敬。朝贺场面结束,

进入“法酒”仪式。所谓“法酒”，就是按礼饮酒、按法饮酒，若饮酒不合礼，则按法处置。只见文武百官个个跪伏其身，按照礼仪没有一人敢于平视皇帝。然后，再按尊卑顺序，轮流上前向皇帝献酒。酒过九巡，司仪官喊：“酒宴到此结束！”执法的御史官当场监督，发现在饮酒、献酒过程中有动作不合礼仪的，当场拉将出去。所以，整场宴会完毕，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喧哗失礼的。刘邦大呼过瘾，高兴地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刘邦本来对儒生极为鄙视，甚至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然而经过这场朝会和酒宴，他终于知道，治理天下还是得靠儒生。于是，当即拜叔孙通为奉常之官，为九卿之一，掌管全国文化和宗教事业。

儒生喝酒的原则，大概都继承其祖师孔子的原则，“唯酒无量，不及乱”。在文人的宴会上，宾主双方也需要一些“不乱”的劝酒规矩。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人，按照传统的三月上巳（上旬第一个巳日）“修禊”习俗，来到会稽山阴（今绍兴）的兰亭这个地方踏青。他们临水宴饮，玩出了花样。让酒杯顺着曲折的溪流漂向下游，漂到谁的面前，谁就拿出来饮酒作诗，称之为“曲水流觞”。春色、流溪、美酒、佳肴，与诗情融成一体。参加郊游的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六人分别作了诗、赋，而另外十六人缺乏急智，竟然没有整出诗来，只好各自“罚酒三巨觥”。这个雅致的场面，被王羲之记载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他的文字记述与他的神逸书法一起流传下来，成为千古绝唱。后代文人，也常常模仿这种流觞游戏，成为一大雅趣，据说现在全国各地“禊赏亭”“流杯亭”之类的风景点，不下几十处。在日本的岩手县毛越寺

（在西盘井郡平泉町），今天仍然保存有“曲水之宴”的诗酒遗风。每年五月的第四个星期天，都会在寺内名为“遣水”的小溪中放杯漂流，表演者身着平安时代的贵族衣冠，按照当天宣布的和歌（わか，由中国乐府诗演变而来的一种日本诗歌体裁）题目，在“催马乐”等古乐伴奏下，演绎“羽觞”流过当即赋诗的风采。不能不令人感叹，“礼失而求诸野”。

严格地说，“流水曲觞”，就是一种酒令。广义而言，凡是为酒宴助兴，劝人多喝几杯的游戏，都算作酒令。用围棋、双陆、骰子、牙牌、猜枚、划拳等游戏赌酒，无不如此。划拳又称豁拳、猜拳，本是俗人之事，古人竟然为它起了一个雅致的专名，叫作“拇战”或“拇阵”。据说明朝的王征福，还专门著有一本《拇战谱》，以记划拳的令辞。朱筠（1729~1781年）是清代的学问名家，特好饮酒，酒量之大，罕有匹敌，可以“连举数十觥不乱”。他还是个划拳高手，“拇战分曹，杂以谐笑”。划拳喝酒，一边车轮战、打通关，还妙语连珠，这与今天大排档上的赤膊拼酒相比，雅俗判然。清朝文人沈复（1763~1832年）的《浮生六记》记载，他与妻子陈芸如胶似漆，闺房之乐无穷，然而新婚花烛的那天晚上，新娘在外陪客，他竟在洞房中与伴娘划拳喝酒，“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来后发现新娘仍然嫁衣浓妆枯坐在旁，真是天下一绝。

狭义的酒令，专指通过文字游戏而劝酒的办法。四书五经、诗词、对联、谜语等都可用来进行文字游戏，决出胜负以劝酒罚酒。早在秦汉，文人间就有“即席唱和”的雅事，诗词酒令可能因之而来。汉末三国时期的大学问家贾逵（公元174~228年），人称一代“通儒”，据说曾经“作诗、颂、谏、连珠、

酒令凡九篇”，不过他创作的酒令现已失传。唐代以来，文人士大夫尤其喜欢行酒令作诗。据说李白、贺知章、王之涣、杜甫四人的联诗，就是诗酒行令的佳话。四人联成的一首诗是：“一轮圆月照金樽（贺知章），金樽斟满月满轮（王之涣），圆月跌落金樽内（杜甫），手举金樽带月吞（李白）。”格律诗味和酒席现场都嵌入得恰如其分。王维（公元701~761年）的哥们元二要远赴安西（今新疆）出差，临别之际王维吟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绝句，席间是否行过酒令，不得而知。

唐朝有个官二代，名叫皇甫松，他中了进士却懒得赴任，反而流连酒场，精于酒令，著有《醉乡日月》三卷。此书现在虽已散佚，但从后人的辑文可知，那时的酒令分作好多种，有骰盘令、旗幡令、闪拿令、上酒令、着问令、抛打令等等。唐人饮酒不仅以诗歌入酒令，还用音乐、歌舞侑酒助兴，饮者与陪酒的歌舞伎之间互动，变出很多花样。例如，红妆的伎女“席纠”（酒司令），向酒席中屡被罚酒的人抛去令筹，被罚酒者要手持令筹起舞。这抛令、送酒、起舞，称之为“打令”“抛打”“抛耍”，手持令筹的酒席俗舞就是所谓“令舞”。唐高宗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大批新兴进士崛起，酒局和饭局越来越多，他们将舞子、乐伎引入士人的流行文化中。其结果是，唐诗达到鼎盛，酒局也越来越歌舞化，自然催生了白居易、元稹与歌妓之间的诗酒故事。这种浮薄放荡之风，在一脸严肃的宋明理学家中根本不可想象，博学如朱熹者，也只是听“深村父老为余言”，据说当时某人的祖父还从乡间收到过这种

唐人的舞谱。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出土的敦煌文书中，竟然找到了好些唐代“令舞”字谱，现在几乎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根据《醉乡日月》，唐代一场二十人的酒局，一般设有三个职务。一是“明府”，又称“樽主”，是执罚者，他主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坐在主人右边。二是“律录事”，选那种有“饮材”（善于酒令、通晓乐舞、酒量大）的人担任，手里拿着大旗、小帜和算筹各二十，用来标明已喝到第几巡、该谁喝、谁犯了酒令。三是“觥录事”，选那种刚毅木讷者担任，专门纠察那些罚酒的过程。犯规的人拱手说：“知罪。”明府就为他斟满酒。犯规者右手拿酒杯，左手接旗帜，律录事转身对乐工说：“奏一曲给他下酒！”被罚酒的人不能漏酒，喝完稽首，把旗帜和酒杯还给



《红楼梦》中的行酒令图

明府,说:“我不敢漏一滴酒。”觥录事又称席纠、酒纠,后来多为女伎充任,由女伎来当酒司令,谁敢不喝?谁不乐喝?

“明府”,是汉代对太守的尊称,汉魏以来一直将州郡守牧称为明府,唐人称县令有时也称明府。“录事”,是汉魏以来刺史、郡守属下的文书官,“掌总录文簿”,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乍一听还以为是在官场,谁相信他们竟然是酒席上的酒官?没错,饮酒本身就带有政治化色彩,酒场执法与官场执法实际差不多,所以又叫作“觥政”。据说战国时期魏文侯与大夫们喝酒,让一个叫作公乘不仁的人主持“觥政”,这位酒司令定下的规矩是:“饮不醺者,浮以大白!”也就是说,谁喝不干净的,罚一大杯。结果,魏文侯本人没喝干净,公乘不仁就要罚他,在座的人连忙打圆场。公乘先生说,国君设令而自己不带头执行,这怎么能行?结果魏文侯不仅认罚喝了一大杯,而且给这位公乘先生拜了官。

直到清朝,以酒令劝酒仍在士大夫和大户人家流行。《红楼梦》里男官女眷、主仆老少经常饮酒,不过似乎都不喜欢干喝,动辄就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书中记载的酒令也很多,射覆、拇战、掷骰子、击鼓传花,不一而足,以至于选择哪种方式竟成为纠结。有一次黛玉建议抓阄,香菱把大家的点子一一写下来做成阄团,竟有十来种。据我统计,《红楼梦》里记载的行酒令,大约有七处,分别是:(1)宝玉与薛蟠、琪官等人饮酒,宝玉做了令官;(2)宝玉与黛玉、香菱、史湘云等人饮酒,探春做了令官;(3)贾蔷与贾环、邢大舅等人饮酒,贾蔷做了令官;(4)贾母与薛姨妈、王夫人等喝酒,鸳鸯做了令官;(5)贾母与贾政、贾赦、宝玉、迎春、探春、惜春等一大家人饮酒行令,玩的

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似乎没有令官;(6)贾珍与尤氏、佩凤等四人在家里喝闷酒,也要行令,不过只是猜枚划拳,似乎也无令官;(7)贾母与李婶娘、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宝玉等人饮酒,鸳鸯又是令官。在曹雪芹笔下,不同的酒客、不同的酒局,自然会行不同的酒令,有的作诗唱曲,有的猜谜联句,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可以讲笑话、说淫词。不拘雅俗,把酒喝下去,把气氛营造热烈就好。

《红楼梦》里,充当令官最多的人是鸳鸯。每次贾母老太太要行酒令,宝玉自然想到“叫姐姐去”。第四十回,她先吃了一钟令酒,说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很是凛然。为什么她总是充当令官?她是贾母的大丫鬟,距离权力核心最近,能拿得到尚方宝剑;她虽然身为奴婢,但为人自重自爱,处事公正,机灵大方,不卑不亢,这样的人才在哪里不会受到信赖呢?酒局就是“觥政”,信哉言乎!

(待续)



◇李笙清

## 鄂中渔鼓

我的家乡在辽阔的鄂中江汉平原一带,善书、评书、道情、小曲(亦称碟子曲)、大鼓、相声、快板、三棒鼓、莲花落、地花鼓等民间曲艺丰富多彩,亦是湖北渔鼓的衍生之地,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色,极大地丰富了鄂中民间文化生活。尤其是那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声声渔鼓,伴着简板与唱词,听起来是那样的亲切而遥远。

### 鄂中渔鼓的起源及发展

关于渔鼓的史料记述,据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载:“渔鼓,裁竹为笛,长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皮用猪脊上之最薄者,用两指击之。又有筒子,以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分,厚半之,其末俱略外反。歌时用二片合击之以和者也。”《湖北说唱音乐集成》第一集亦有关于渔鼓的历史描述:“宋、金、元年间,道士和文人为道情所作之词或散曲,可谓风靡一时。其演唱纯为徒歌,五丝竹乐器

伴奏,仅一手抱渔鼓并执简板,相击成声,以为节拍。”鄂中渔鼓一般亦用竹筒制作,对径三寸粗,长约八寸,空管,一端蒙以猪油膜或鱼皮。拍渔鼓一般要配上用竹片制作的简板。演奏时,以清唱为主,演唱者怀抱渔鼓,右手指拍击下端的鼓皮,时重时轻,配之以简板的敲打,有的还配以小小的铜钹,合音悦耳动听,节奏明快简约。

作为一种流行于沔阳(今仙桃市)为中心的鄂中洪湖、潜江、天门、监利、京山、汉川等地的曲艺曲种,其历史悠久,又称为“筒子腔”,据说是由道情发展而来,最早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据元代《唱论》和清代徐大椿所著《泗溪道情自序》记载:“渔鼓道情自唐代以来,仅仅局限于道教警世劝善范畴之内,清末衍变为民间曲艺形式。”再查阅出版于2002年的《湖北民俗志》,才知道流行于鄂中江汉平原的渔鼓大约形成于清嘉庆(1796~1820年)初年,传播颇为之盛:“清代随着道教的衰落,渔鼓道

情便由宣扬道教出世思想的工具，衍变为具有民间娱乐性质的曲艺形式，题材内容多为民间故事、神话、传奇、案卷、小说等，街头巷尾，酒楼茶肆，都是渔鼓艺人的表演之地。”

渔鼓自清中期流入鄂中地域后，作为一种简单明了的曲艺表演形式，深受鄂中各地群众喜爱，很快发展形成规模，从事渔鼓表演的艺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面对这种情形，官府曾以有伤风化为名予以禁止。据纂修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张氏宗谱》载：“本族七房多百戏，渔鼓、三棒鼓尤优……所到之处，翘首伸颈，围于堵墙，大伤风化，出示禁止，稍加敛迹。”尽管官府明令禁止，但渔鼓这一风格独特的曲艺表演形式已经深入人心，渗透于城镇村落。经过代代艺人的传、帮、带，鄂中渔鼓还涌现出一些驰名一方的渔鼓表演名家，他们四处表演，广收门徒，使渔鼓这门曲艺在鄂中各县民间迅速活跃起来并得到很好的传承。据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沔阳县志》记载：“清道光至光绪年间，皮思金、皮思银、张宏显、刘泡等名人，被誉为‘三根半筒子’(刘泡技艺稍逊，被称为半根筒子)。”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鄂中渔鼓逐渐形成了沔阳(今仙桃市，包含当时为沔南的洪湖地区)派、平江派、潜江派等不同流派，有的平稳质朴，有的泼辣风趣，有的流利委婉，各具特色，极大地丰富了鄂中渔鼓艺术。清道光后期，洪湖曹市皮家横堤的皮思金、皮思银两兄弟，将皮影戏引入鄂中地区，以沔阳渔鼓行腔、方言道白演唱，形成了具有鄂中地方特色的沔阳皮影戏。尔后，张宏显、刘泡等著名渔鼓艺人相继组班演唱筒子腔渔鼓皮影，并收徒传艺，仅沔阳三路渔鼓(按地域分成的上、中、

下三路渔鼓)传承至今，渔鼓艺人已有几代数百人之多。清咸丰年间，皮氏兄弟传徒陈大焕、陈大海，渔鼓皮影演出在集镇、渔村无处不至，由于唱词通俗易懂，诙谐幽默，唱腔以渔鼓为主调，融合了流行于江汉平原上的花鼓腔，节奏欢快活泼，曲调高亢豪放，加上方言道白耳熟能详，使渔鼓皮影在鄂中地区日益盛行。

鄂中地区滨临长江，晚清至民国时期堤防建设十分落后，十年九水，水灾频仍，以至于走村串乡沿门乞讨的灾民很多。大概受“蓝采和持筒板唱踏歌行乞于市”的影响，渔鼓仿佛是为募捐化缘量身定做的工具，灾荒年里，很多人就是靠渔鼓、三棒鼓及敲碟子唱小曲谋生。据《洪湖县志》载：“明末清初，渔鼓在洪湖地区已成为逃水荒时主要的乞讨工具。”行乞的渔鼓艺人大多是单口唱的表演形式，唱词大多是艺人即兴编的《荒年歌》等，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而顺利得到施舍。渔鼓艺人一般肩背缝有两只口袋的“布褡子”，一只口袋装渔鼓筒板，另一只用来装主人家施舍的大米、粗粮，披星戴月，颠沛流离，赶场红白喜事，穿行千家万户，那渔鼓声中，透着一丝辛酸的成分。

到了民国初年，与各行帮一样，鄂中渔鼓表演者自发成立了渔鼓行会，以陈焕玉为首的八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渔鼓技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爱好文艺的革命知识分子创作了不少渔鼓词，如《革命胜利歌》《洪湖渔民》《妇女解放》和《土地政纲》等，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配合渔鼓表演演出。这一时期，创作了《当兵就要当红军》《贺龙军》等多首渔鼓词，渔鼓皮影则演出过《活捉张辉瓒》《段德昌战张联华》《水上挺进队》等反映红军胜

利的新作,渔鼓成了一种革命的传播介质。1931年后,鄂中渔鼓辐射到周边的武汉、宜昌、沙市、黄石、鄂城等地。建国后,鄂中各县大多成立了县渔鼓皮影队,积极参加土改运动、清匪反霸等宣传工作,除了演出《王佐断臂》《包公铡庞玉》《白蛇传》等传统节目,还演出过《夺印》《三碗黄豆》《荆江分洪》《社会主义好》等新节目。1958年,沔阳渔鼓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时,由湖北省音协改名为湖北渔鼓,在全省各地四处传唱。1979年后,在“文革”中被视为“三坏”“四旧”而遭禁演的渔鼓皮影及渔鼓表演得到复兴,鄂中各地的集镇大茶馆、酒楼纷纷聘请渔鼓艺人、渔鼓皮影艺人表演助场,剧本多为《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等,由于这些剧本连续性强,故有的艺人在一地会连续演出多天。

如今的渔鼓皮影戏班与草台花鼓戏班一样,活跃在广阔的乡镇农村,婚丧嫁娶、新居落成、生日庆典,以及其他各种乡俗活动,渔鼓和渔鼓皮影都是增添气氛的重头戏。渔鼓皮影艺人大都是半职业性的,将演出当作一种副业来经营,农闲时演出,农忙时回乡生产。正是因为渔鼓这门技艺代有传人,所以才绵绵不绝。

### 鄂中渔鼓“敲打说唱”的艺术特色

鄂中渔鼓敲打的伴奏方法主要有撞指、滚指两种,撞指即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并列撞击鼓皮,音响效果浑厚浓烈。滚指分为单滚和双滚,单滚是用食指和中指相互交替弹打,双滚是用食指、无名指循环交替弹打,技巧十分丰富。有经验的艺人在表演时单、双滚指法结合娴熟,节拍起伏,鼓声多变,配合唱腔,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扣人心弦。

表演形式说唱结合,讲究韵、散相间。讲的部分有散白、韵白两种,散白接近口语,用作叙述故事情节,或者模拟不同人物的语调;韵白有叙述、代言两种,对节奏韵律要求较高,伴以简板。演唱形式主要有单口唱、对口唱和伴唱皮影戏三种,建国后还出现了群唱的表演形式。单口唱多为单独走村串乡的艺人演唱,对口唱则多为夫妻,男的手拍渔鼓、打着简板,女的用筷子敲着碟子伴奏,二人一唱一和,有板有眼,十分协调。

渔鼓唱词较为常见的主要有五言、七言、十言或“五七”言体制,亦有少量三言、四言等短句参杂其间。七言一般分成二、三、三等三个音节,限用一辙;十言的自然音节是为三、三、四;“五七”言则是四句一组,即第一、二、四句为五个字,第三句为七个字。无论是何种句体的渔鼓词,均讲究句句押韵上口,音韵和谐,韵脚主要有“光、消、板、修、歌、麻、洋、于、亲、乖、为、克、四、中、福”等十五韵。鄂中渔鼓有专门的曲调,俗称“唱道情”,唱腔由流行民歌小调发展演变而成,曲牌有平腔、鱼尾腔、琵琶腔、悲腔、杂花腔等五类共二十多种曲牌。平腔以叙事为长,旋律平和简洁,语言性较强;鱼尾腔只有七字句一种形式,曲调明快秀美、轻巧流畅,被称为“喜腔”;琵琶腔以表达激情似火的情绪,铿锵激昂,跌宕起伏;悲腔旋律曲折婉转,用以表达哀愁、悲愤的情绪;杂花腔是渔鼓的辅助唱腔,旋律、调式、衬词等与前面的四种唱腔都不同,朴素粗犷,主要用于唱腔的变化。花鼓戏《珍珠塔》的《二会楼》《方卿戏姑母》的道情简板和表演方式,就具有鄂中的地域特色。后来,中国曲协会员,著名皮影、渔鼓艺人龚本槐(1907~1993年)在原来的渔鼓演唱基础上,

发展创造了新平腔、女平腔、凤尾腔、数板、联板等二十多种曲牌，并增加了二胡等弦乐伴奏，使渔鼓及渔鼓皮影表演更加丰富多彩。

由于渔鼓唱词一般来自渔鼓艺人的创作，贴近生活，逐句押韵，朗朗上口，唱腔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熟悉的乡野村调，加上富有浓郁的鄂中江汉平原地域特色，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域内百姓欢迎。

鄂中渔鼓唱腔结构为联曲体，一个曲目的音乐唱腔，大都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曲牌联缀并列组合而成，形式较为自由、奔放，曲头、曲中和曲尾的曲牌可以灵活选用，很难找到两个曲牌组合完全相同的曲目。唱腔富于特色，或平稳、质朴、温柔醇厚，此为平腔渔鼓，或泼辣、风趣、热情、高亢，此为高腔渔鼓，不同的唱腔表达不同的情绪。渔鼓后来融入到皮影戏中，除了渔鼓和筒板，还增加了丝弦乐器，音乐变得丰富起来。渔鼓皮影在演唱形式上，多半都是演“案”“传”“演义”等大部头连台剧目，如《施公案》《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也夹杂演一些短小精悍的传统剧目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如《迷路记》《二度梅》《三门街》《大刀风云》等，其中有些是艺人自编自演的曲目后来广为流传，如《十三款》后

来被改编成为天沔花鼓戏（今荆州花鼓戏），一直传唱到今，深受群众喜爱。

### 我难以割舍的渔鼓情结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的乡村还很落后，走街串巷以敲打渔鼓为生的艺人较为多见，所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这门技艺似乎挂着“乞讨”的标签。虽然如此，但渔鼓艺人亦有较为严格的行规，比方说师承关系，拜师的礼仪就一点也不马虎。

记得老家老街住着一个孤寡老人刘爹，为人和善，总是一脸慈祥的笑容，听爷爷说就是拍着渔鼓流落到小镇上落下脚的。小时候，我每天穿过老街去上学，常常听到他那低矮的屋子里传出“咚”“咚”的渔鼓声。夜里，由于经常停电，刘爹家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前，经常坐满了人，大家一边磕着瓜子，喝着刘爹家那把大茶壶里用“三皮罐”泡出的茶水，一边聚精会神地听刘爹敲着渔鼓表演说唱。对于听渔鼓表演，



渔鼓皮影戏伴奏道具

童年的我是没有兴趣的，有时也偶尔随着爷爷奶奶去听过，唱的大多是八仙传说、封神榜、包公断案之类的民间传说故事，有时候，一个故事需要连续多天才能演唱完，弄得那些街坊邻居天天挤满刘爹的小屋，如一部《七侠五义》，就说唱了近一个月。每天说唱完毕，大家会自觉地给一点钱，至于多少，刘爹从不计较，随个人的心意而已。在刘爹家的堂屋神案上，供奉着渔鼓祖师爷的牌位，上面书写着“唐朝敕封老郎王神位”，一个铜香炉里插满了烧过的香的残枝。据说农历三月十八是老郎王祖师的生日，每到这天，刘爹的徒弟们不论远近都会来到老街，在刘爹的带领下给祖师爷焚香礼拜，叩头作揖，十分虔诚。

那时候，每当大门口有渔鼓声响起，有诸如“渔鼓拍到主人家，六畜兴旺人丁发……”之类押韵的渔鼓词唱起来，父母总会递上几分钱，或者在米缸里舀上半碗米端到门口，渔鼓艺人便会将随身背着布袋打开，将米倒进去。有时遇上我们家正在吃饭，打渔鼓的人会递上一只大碗，让母亲给他盛上一碗热饭，夹上一些菜。走乡串村的渔鼓艺人有着特别的规矩，无论主人如何盛情邀请，都是不进门、不上餐桌的，他们一般会收起渔鼓、筒板，接过饭碗连连称谢，然后蹲在门外香甜地吃起来。有时吃完饭，渔鼓艺人会唱上一段《吕蒙正赶斋》或《张果老逃婚》以表示感谢，尽管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伴奏，但渔鼓声声，俚语民谣，倒也声情并茂，引来孩童围观，主人拱手。唱完拱手而别，再前往下一家。

有时候，渔鼓艺人亦和三棒鼓艺人结伴而行，一起演唱，一时间唱腔悠悠，鼓声不绝，三根木棍上下翻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引来观者无数，好不热闹，每到这时，主

人家奉上的东西是要加倍的。那时候，在广袤的乡镇渔场，每逢有人家办红白喜事，总少不了请渔鼓艺人来演唱助兴。每到这时，艺人会根据实际情况演唱曲目，如遇上做寿的则大多唱《韩湘子做寿》《蟠桃会》或《八仙庆寿》等，说唱的都是充满吉祥的祝寿内容，如《韩湘子做寿》，开篇唱词即是“数九寒冬天气寒，韩湘子出家在终南山；山洞里面把经念，想起了唐王的生期在今天……”唱腔清脆婉转，配上渔鼓、筒板悠扬的伴奏，活跃了几多气氛。

这些年来，鄂中广大乡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乞丐已极为少见，渔鼓也几乎在乡村销声匿迹，如今只能偶尔在观看渔鼓皮影演出时，才能从中聆听到那遥远而又熟悉的声音。目前，经过岁月沧桑洗礼的鄂中“天门渔鼓”“沔阳渔鼓”及“仙桃渔鼓皮影”已入选湖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渔鼓这门古老的曲艺得到很好的传承与保护，诚为时代幸事。

我爱听这声声渔鼓，它是江汉平原上的劳动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结晶，经过一代代渔鼓艺人的传承，沧海桑田，历久弥珍。它像家乡的河流一样在我心中长流不断，充满了浓浓的乡情风味，犹如穿越岁月时空的天籁之音，在我耳畔久久回响。

◇李瑞洪

## 雅舍清风笔墨情

——“顾蓓、王心耀教授中国画小品展”简述

2016年9月10日第31个教师节之际，“雅舍清风——顾蓓、王心耀教授中国画小品展”在武汉博物馆开幕。此次画展由武汉博物馆主办，明清雅舍协办。展出画家顾蓓、王心耀近期新作五十余幅。顾蓓、王心耀均为江汉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适逢教师节画展开幕，展厅作品以具象的形态和写意的笔墨，让观众意识到他（她）们不仅是作为老师的社会身份，同时也是有着文人情怀的独立艺术家。

正如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先生在题为“时间的玫瑰”画展前言中的准确定位：“江汉大学美术学院顾蓓教授绘事三十余年，她的画作恰如时间的玫瑰，执着、沉静地绽放，给人以清新、纯净、自然的美感。无论是令她成名的都市女性作品系列，还是本次展览的小生灵水墨小品，都不矫饰，不造作，这其中不乏浮世之美，更兼温柔之

爱。她以一个女性的诚实和细腻，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艺术的追求。王心耀教授是湖北画坛近年来成就斐然、无可争辩的中生代领军人物，更是美术教育领域卓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多才多艺，儒雅风流，其画如人，其人胜画。从油画到水墨，从人物到风景，特别是此次新创作的扇面，他经历的是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和艺术创新。他的作品是自己心象的重构，具备了中国画在形式意蕴方面的种种特质，其画风清雅、隽永、宁静，常常带给俗世中人心灵的慰藉。”

艺术家的爱情故事，自古代“赵孟頫、管道昇”开始，近现代则有谢稚柳和陈佩秋、吴湖帆和潘静淑、刘海粟和夏伊乔、吴作人和萧淑芳、卢沉和周思聪等。喜爱艺术的人，由他们的作品出发，进而了解他们的人生和艺术之外的故事；对艺术不甚了解的人，很多则因画坛伉俪们成就的佳话，而

开始了解他们的艺术,开启了一道艺术欣赏的大门。

细细品读顾蓓、王心耀伉俪二人的新作,山水也好,花草也罢,它们都赋予人格化的情感,从中体味生生不息的创新灵感。这正所谓,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水流花开,相得益彰。

唐代王昌龄论诗有三境,其著《诗格》中叙“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顾蓓与王心耀创作的绘画作品清新淡雅,具有象征性、符号性的意象造型特征,他们艺术创新的征途上相互勉励,共同成就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展览中顾蓓的猫咪系列作品,灵动洒脱的画面隐藏着深厚的传统积淀与现代形式构成韵律。无论水墨氤氲出宁静淡然的形象,还是墨色交映出清新典雅的氛围,作品既彰显笔的情韵,同时也显现出墨的稚趣,因此,博得众多观众的青睐是必然的。

顾蓓的中国画系列作品《时代丽人》紧紧抓住了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情趣,她和王心耀都充分认识到写生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为了发现题材,更重要的是通过写生感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意趣和情趣。

顾蓓以女性的细致发现生活中有趣味的情节,并将它们展现在画面上。在《都市丽人系列》和《猫咪系列》中,顾蓓以特有的感觉,处理画面中的细节,没有过多的去追求形式上的新颖,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朴素的顾蓓。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顾蓓,其油画作品《享受春风》获“湖北省高校第三届美术大展”金奖,并入选首届《全国艺术硕士(MFA)研究生美术与设计优秀作品集》。

我曾撰文评论:顾蓓作品所担当的是

对于都市女性心灵指向的一种引领,她的造型与色彩由此切入,并丝丝入扣。画面人物造型严谨、色彩和谐,一派阳光气象。诗歌般的含蓄、散文式的铺排,相得益彰地构成隽逸的形式美和丰富的表现力,从而把她为“都市丽人”倾情的艺术旨意和内在蕴籍,不动声色地抵达观众的心灵,并于不经意间将我们的心灵拨弄出音响。这音响似乎从遥远的天际传来,如此轻盈而又如此美妙。当音响飘过,我们从那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面中,不无欣喜地看到,那一个个都市少女终于打开心灵的“起落架”,安然地“着落”了,她们着落在明媚的阳光下,着落在自我的灵魂里。于是她们的精神显得充盈饱和而不虚无。

王心耀的水墨画水墨语言娴熟、清新洒脱,画面具有丰富的色彩感和现代形式感,看似淡雅宁静的画面中却蕴含着生命本真的律动。他已将传统水墨语言成功地转化为具有当代艺术特性的水墨语言。

展厅里,人们津津乐道王心耀作画的墨韵淳化和他用笔的出神入化,肌理凝厚,渗化天然。要实现这番笔情墨趣,先要简笔提炼,这种简笔并不是一般的减法,而是能将人物作整体相看,并常凝炼成高度概括的符号,在对比中相衬出一瞬一息的顾盼流连,一举一掌的执重沧桑。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任江汉大学美术学院兼设计学院院长、汤湖美术馆馆长的王心耀油画作品《高原的祈祷》获“中国当代青年画展”金奖。他多次深入藏区、深入大江南北,完成了大量写生。在雪域高原,他住帐篷,画过饱经风霜的老阿妈,画过铸铜般的牧牛汉子,画过在晨曦中汲水煮茶的雪域少女……这么多年来,王心耀利用教学之余,登天山、赴藏区、走滇南、游

海岛,领略不同民族瑰丽多彩的文化和风土人情,足迹几乎踏遍大江南北,艺术境界也由此得到升华。在此次展出的《藏女图》《高高的云》《回草原》等一批精品佳作中我们看到,作者通过绵密意向的铺陈、排列、组合,多而不杂,繁而不乱,让人联想天地之广,宇宙之大;让人联想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大自然。其艺术风格在《雪域图》等作品中亦有体现。这也正如著名画家冯今松先生所言:“王心耀的水墨扇面画自有一股抒情的诗意溢于画面,追求一种东方的构成,让人从中领略中国文化的典雅与精致。紧凑的画面宛如一团墨色的璧玉。辽阔无际的原野,沉重的远山,苍茫的太空,给人以睡一般的宁静,梦一般的迷离。画面集自然情调和人情意味于一体,情景交融,生机勃勃。细细地品读他的作品,动心的诗情性就会悠然而生。”

王心耀在扇面创作中,追求书写性的笔法,具有很强的情绪化特征。这里所强调的“书写性”,是以中国传统书法为基础,也是与时下较流行的“制作性”相对应的。在团扇《观海图》《春风图》《清风图》等作品中,画面因力避任何规整而呆板的风格而显出活力,在稳健中迸发着激情,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力量与扩张。充满与自然生息相关的关注,对生存状态的温情感慨。

作品《藏女系列》创作来源于他高原采风写生的灵感。一望无垠的高原,劳作归来的藏女脸上是那样一种满足的本真的憨笑,画家诚挚地关注着眼前最朴质的存在,敏锐地捕捉住现代化冲击下逐渐消失的农耕文明的精髓,表现一种吉祥和谐的人文理想,一种安定永恒的自在力量,让人眼前一片豁然。《高原图》《回草原》等系列是画家参悟生活、透析人生的百感交集,作品中

“致虚极、守静笃”的艺术世界,阐释了老子哲学的高妙境界。

王心耀的展览作品突出展示了构图置景的能力——不是依照模式化的老套子而是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象中挖掘,不是简单地搬挪写生而是有构建、有创意,这些作品几乎具备了中国画在形式意蕴方面的种种特质:平远、深远、高远,天高云淡、山高水长,笔饱墨酣、情韵意长,以及从自然中汲取的平和简朴质素与一波三折的柔缓,这使得他对自然的吟唱咏叹与深度抒情得到高度发挥。当著名画家李宝林品读了这些画作后,激动地说道:“看王心耀的作品有一种久别的激动,画面的神秘感扑面而来。点与线、黑白灰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作品耐看,不火不燥,不露痕迹。好的绘画作品是由其作者的修养、感觉、个性构成的。王心耀作品中透露出深厚的修养、敏锐的感觉和鲜明的个性,这些已构成王心耀水墨画艺术独特的语言特征。”

谈到最近创作的这批小品,王心耀表示,这些轻松的作品,更多的是自己生活常态的情趣流露,这些情趣对生活来说是“润色”,但是对绘画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审美因素。

清代画家恽南田曾经在《瓯香馆画跋》中说过,“有笔有墨谓之画,有韵有趣谓之笔墨。”中国水墨画强调笔情墨趣,画中的趣味是立足于审美态度的表现来追求艺术创作的重要评价要素。包含着创作者真实情感、个人修养的水墨画中“趣”,不止作为一种材质与技法的运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思想的呈现,在艺术家运筹笔墨时渗透出的个人的审美志趣、文化素养、个人气质和个性化的情绪感知力。